

8

# 乌拉特前旗文史资料

## 第一辑目录

( 1—11 )	解放前乌拉特前旗建制简介 .....华吉日戈
( 12—32 )	原安北县的建制概况 .....董玉奇
( 33—89 )	解放前乌拉特前旗贵族喇嘛之间的 权利斗争史.....华吉日戈撰写 张世杰整理
( 90—129 )	日寇侵占大余太时的简况...董玉奇
(130—146)	原安北县王锦云副县长等遇害简要 经过.....董玉奇
(147—160)	我们所知道的乌梁素海 .....陈建盛 董玉奇

# 解放前乌拉特前旗建制简介

华吉日戈撰写

乌拉特部是乌拉特三公旗的总名称，内分前中后三旗，故乌拉特三公旗或连称，或分称，都得冠以乌拉特之词。其境北与哈拉哈蒙古接壤（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东至达尔罕旗、茂明安旗及大青山脚下的土默特川；南与鄂尔多斯毗邻；西临阿拉善旗。

据《蒙古游牧记》记载：“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布尔海，游牧呼伦贝尔，后移于此，号所部曰：乌拉特，并分为乌拉特前中后三旗。前旗扎萨克封号镇国公，中旗扎萨克封号辅国公，后旗扎萨克封号镇国公”。乌拉特部设在乌拉山的哈达门沟口子。其境内幅员辽阔，有巍巍耸立的大山，有浪涛滚滚的河流，有浩瀚霾霾的戈壁，有一望无际、平坦无垠的平原，有明净清澈、碧波荡漾的海子，有连绵不绝的丘陵平川。在这土地肥沃，水草丰盛的大地上，生长着

四季长青的松柏树等高大乔木，郁郁葱葱的灌木林里有酸枣、柠条、红柳、杞柳遍及山沟河滩。在草原上盛开着名目繁多争相吐艳、香味扑鼻的花草，真是得天独厚的优良大牧场。尤其是在高耸入云的乌拉山上生长着千年松万年柏，盛夏翠绿装点关山，严冬白锦披挂裹身，更是千姿百态，迎风斗雪，显出铮铮铁骨，令人肃然起敬。

乌拉特前旗（亦称乌拉特西公旗）西界与阿拉善旗连接；西北至狼山那仁乌拉南北两侧；东至宝格图；南临黄河北岸。但现在黄河南岸包头西南方的昭君坟（即包头西南侧的土傲包，蒙语叫突木尔乌拉哈）、满罕搭拉、四村、谈盖莫独、满海特、奴霍突等地区，早先也是乌拉特前旗的管辖范围。这些村落到黄河南岸的原因是由于黄河主航道北移而所致。明安、大余太、小余太中的部分插花地和苏独崙、德岭山等地区均归乌拉特前旗管属过；而现在的杭锦后旗、临河五原境内，过去亦有乌拉特前旗的牧地。

### 解放前乌拉特前旗衙门的机构设置

旗扎萨克行使最高权力的形式是旗开印大

会。会议规定每年召开两次，一般情况下在春初秋末举行。上至旗扎萨克，下至各苏木的官吏们都要参加。会上，讨论决定全旗政治、军事、工农牧业生产、商业、民事、教育及财政收支概算和税收等事项；决定旗军政官员的任免及授予平民顶衔等事项。旗印在每年腊月封闭，于第二年春季开封启用，故而有开印大会之举。开印大会分别在春秋两季召开。春季开印大会会期很短，只宣布旗官吏任免顶戴事项及部分旗务的处理，此项工作完毕，即行散会。秋季开印大会会期较长，有时可长达一个半月。秋季开印大会一次性地解决全旗军政、工农牧业、民事、刑事等方面的问题，并分别任命各官吏到各苏木实施各项具体任务。闭会以后的常设权力机关是旗衙门。旗衙门是旗开印大会决定事项的执行机关。开印大会闭会时举行赛马、摔跤、射箭等文体活动。骑手、摔跤手、射手们披红挂绿各显其能，围观群众有的呼喊，有的拍手，群情激动给选手们助威。这项运动也称之为好汉三艺。

旗扎萨克是全旗权力的主宰者，为一旗之长。扎萨克下面设有左右两个协理（即图斯拉格

其），协助扎萨克处理旗里的重大事务。在协理下面设一个旗总管（即哈少佳格尔其），设两个梅林章盖，分别管理六个苏木；梅林章盖下设三个参领（即扎楞章盖），各管四个苏木。全旗共设苏木十二个，即尤何苏木、巴格苏木、塔布达苏木、都腾苏木、尤何阿拉特勤苏木、高勒苏木、巴格阿拉塔勤苏木、鄂吉格沁苏木、乌兰奴德苏木、何日奴德苏木、哈日奴德苏木、焦沁苏木。每个苏木设有苏木章盖、苏木鸿德、苏木保喜格、图日勒达四人组成管理本苏木的事务。每个苏木有一本贵族台基的“家谱”详细记载着户主姓名、家庭人口。平民和奴隶也有记载册子，但不称“家谱”。如苏木章盖变更，就将家谱记册移交新上任者。

旗扎萨克设有旗军队，并任命将军佳格尔其，管军梅林统帅军队，用以维护地方治安。设有一个哈少公中，主要职责是管理土地、粮食及后勤工作等。衙门的公务人员实行轮流值班，处理旗政的日常事务。具体做法是每年轮换四次，一班为三个月。每个轮班中有师爷一名，书记长一名，协理文书、实习文书等十多人。这些公务

人员是义务应差，应差期间粮食由哈少公中供给，肉奶食向各苏木摊派。早期衙门没有固定地址，为适应民族生活习惯，游牧的特点，衙门随多数民众聚居点的搬迁而迁移。（衙门职官名称表附后）

文书处理有严格的规定。文书档案有两个文卷，一个叫旗卷，一个叫官吏卷。旗卷又包括两种，一个是发卷，一个是收卷。从旗里所有发向上级的呈文，各旗传递公文，发至各苏木的行文都记录在发卷内；收卷是上级来文，外旗传递公文，各苏木呈文都收录在本卷内。官吏卷专门记载旗内务事项。旗卷和官吏卷均由师爷起草记载写在册子上，尔后由文书誊写在旗卷和官吏卷上，最后折叠，用红布封包存档。

旗扎萨克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制定了法令法规，来统治旗民。其刑法分轻重两种。罪轻者用巴掌板（巴掌板是里边装有铜钱，外边用皮子包成掌形，故称巴掌板）打耳光，用黑皮鞭子抽打腕部。罪重者是挂铁链、上枷板、流放、罚款（包括款与物两种，有的被罚的到了家徒四壁的程度）四种刑法。刑具有巴掌板、黑皮鞭、木杠

（压杠子用）、铁锁链、榆木大枷等。旗里没有监狱。罪轻者是由师爷决定怎样处罚和由谁来执行。罪重者是由扎萨克来亲自决定处罚。在衙门内由衙役来执行，而一切决断大部分在秋季开印大会进行。行刑时贵族台基都穿上官服，戴上顶衔，按官衔高低排列入座，监视刑罚的执行。各旗如发生重大纠纷用召开“阿庆朝格勒”（即儿方会或联席会）来解决。

### 前旗人口居三旗之首

乌拉特前中后三旗，当时各自统管境内的民众，在掌管地区方面，只有个大概的轮廓范围，所辖地界并没有明确划分。因此，牧民们任选营地，随草游牧，逃难避灾形成习惯，迁移自由，交叉居住。各旗的官府只好分别管理在本旗立户，到他旗游牧的民众，这就自然形成了集中与分散定居的特点。据民间传说前旗人口众多，但因没有记载，已无法考证。据民国二十二年（即公元一九三三年）的调查统计标明，乌拉特前旗当时有二千四百八十五户，一万二千五百一十六人（不包括所辖地区的汉族）。据说比中旗、后

旗的人口多，居三旗之首。当时蒙古人大多数从事牧业生产，居住在乌拉山的南北麓。此外，沿黄河北岸的哈业脑包、土黑麻淖尔、打不素太和黄河南岸的昭君坟、四村、谈盖莫独一带，查石泰山、德岭山、狼山、那仁乌拉南北麓，阿拉善旗附近的哈日嘎纳河，也住着乌拉特前旗的蒙古族人。

### 进京朝贡皇帝 老少游山玩水

清末民初时，当朝的执政者规定，各蒙旗每年须向朝廷朝贡（即朝拜）一次礼品。传说有“九九八十一”的礼规，即朝贡的礼品为九种，每种的数量为九，总共是八十一件礼物。贵族们为了在皇帝面前讨得欢心，精心挑选珍贵的上等物品作为厚礼。内有金银、绸缎、珍珠、玛瑙、翡翠、马匹等。扎萨克进京朝贡时，还要把妻子儿女领上，长时间住在京城。有时与显官达贵谈天说地，攀亲联友；有时带着妻小游览名胜古迹，走逛京都闹市，饱览眼福，吃喝玩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耗费大量钱财，而一切费用又转嫁贫苦牧民。贺喜格德力格尔在公元一八八六年至



一九二四年任前旗扎萨克期间，挥霍无度。他在一次赴京朝贡中就挥掉变卖耕作条件优越的可耕地八百顷土地的银款。他把东起王村圪旦、西至李兰保圪旦、北临纳林哈腾（今三湖河）、南至黄河的八百顷大的草牧场，卖给了昇恆号（今先锋乡）大商人。有一次，在官吏刘宝桑杰的主持下，把土黑麻淖尔、塔本补隆、哈日补达、打不素太等地的大量土地卖给了垦务局；一部分作为放地出租给有权势的大户人家；还有一部分作为礼品赠送给有权有钱的头面人物。刘从中捞到大批金银，塞进了自己的腰包。为了遮人耳目，最后在包头园子巷买了一座院落，作为前旗驻包办事处，实际上是当时专为官吏们设的“别墅”。后来又在办事处设立了学校，起名叫三公旗学校。在校学生并不多，只有二十多名，但当时为蒙旗办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是他以办学为名，在狼山南部同义隆一带又开垦数百顷牧场，名曰学堂地。因刘宝桑杰到处出卖开垦土地，民众反对，曾受过扎萨克的处罚，戴铁锁链达一年之久。

旗扎萨克还把德岭山、狼山南麓的苏独崙、胡鲁斯台、齐力、同义隆、东升庙、善丹庙、太

阳庙一带的滩地同样卖给垦务局或租给大地主开垦。贵族们为了自己能过醉生梦死的生活，不顾多数贫苦牧民的反对，他们不仅出卖好地，连次地、旱地也一同卖掉。大小余太、明安川有三公旗管辖的不少插花交错地，也卖给了垦务局和有钱的大户人家经营。腐败情落的扎萨克贵族，凡是在出卖土地的范围內，耕种务农，放牧养畜者，要交纳水草费。畜主每年每头牲畜要给衙门交银元一圆至一圆半，这些银元实际上都装进了达官显贵的私人腰包。出卖、出租大量土地，迁入农户，牧民和农民交叉居住，为此，建立了设治局和县来管理。朝廷采用旗县并存的手段，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 兴宗教建庙宇 共密谋卖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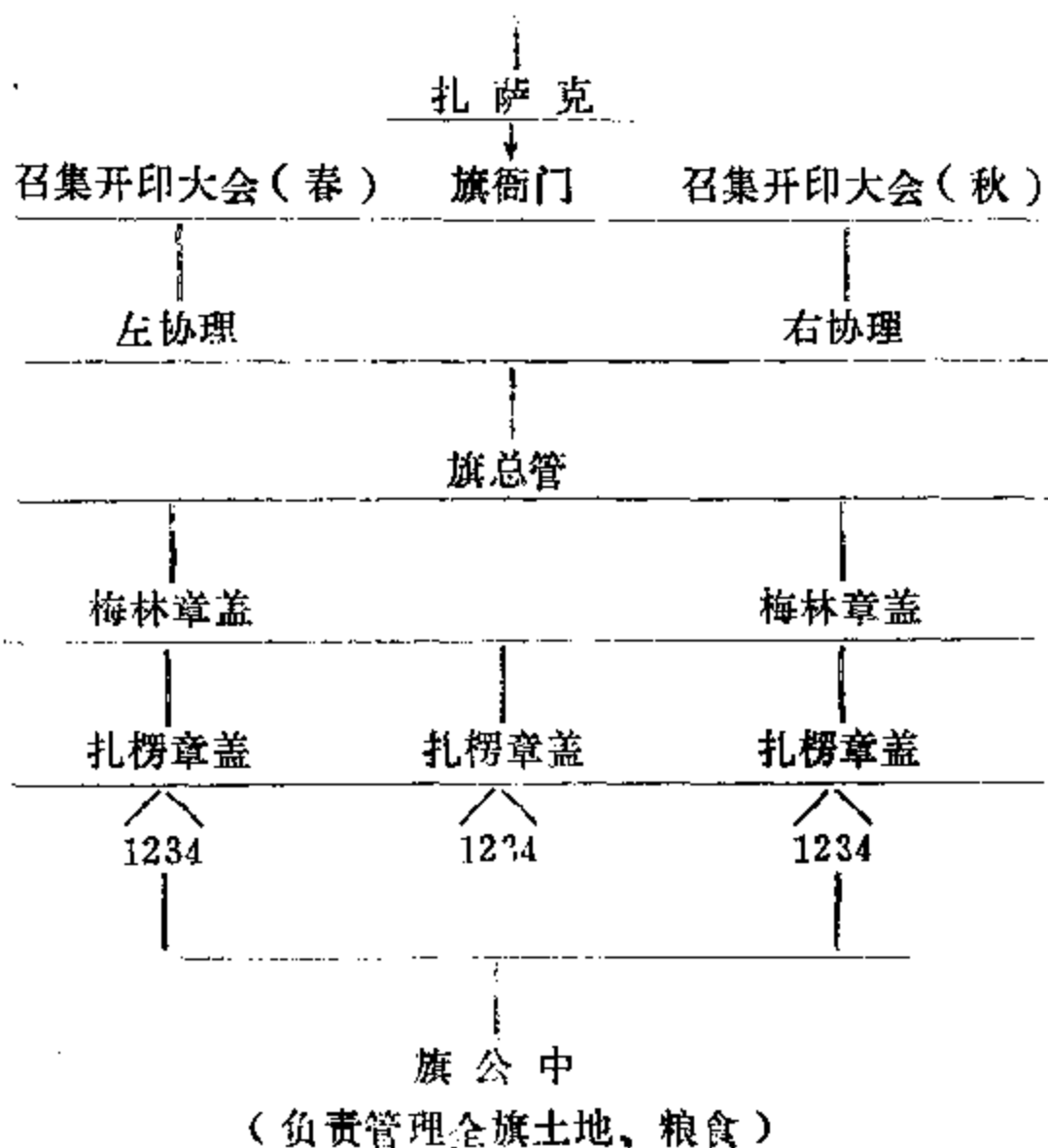
清朝统治期间，也是三公旗宗教势力兴起的顶盛时期。乌拉特前旗境內大大小小的二十几座寺庙，大多数是在这个期间修建的。由于挥霍浪费，财力拮据，上层喇嘛与贵族们合谋，多方搜刮民脂民膏，他们向群众划布施、摊派苛捐杂税，用以维持上层喇嘛的享受和众喇嘛的生活，

但经济上仍难摆脱困境。因此，旗扎萨克决定给各寺庙划拨土地，以收租的办法来弥补经济不足，仅梅力更一座寺庙就拥有八百顷土地。还有公苏木庙、点布寺庙、贵族大户、东商、西商、东达商、哈少公中等，也以同样形式在稽菱滩、中滩划拨到大量土地，以吃租作为庙宇收入。

贵族们把几百顷的天然牧场演变为农田。最早是从乌拉山前东起宝格图，西至山咀退水两侧，南到黄河北岸这个地区开始垦荒，后来在旗境内相继也出现了不连接的一块一块的农田。

由于军阀的连年混战，人民无辜遭涂炭，贵族上层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扎萨克贵族大量出卖土地，破坏了草场植被。结果草原退化，牧地有的沙化，有的盐碱化，自然生态恶性循环，洪水泛滥成灾。在旧社会，黄河水涨，村庄农田被淹，蒙汉各族人民三年两灾。每到灾年蒙汉人民弃家离乡，拖儿带女，外出逃荒。昔日的美丽草原，满目凄凉。

## 解放前乌拉特前旗衙门机构设置及管理范围



# 原安北县的建制概况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五八年)

董玉奇

原安北县，从其前身“设治局”开始，到改成县并入乌拉特前旗为止，曾经历过清末、民国、日伪和解放以后等阶段，共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里，由于掌权执政者的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不同，主宰与改造社会的途径方法各异，因而在体制设置，行政区划等各方面，不断发生“分、合、设、撤、大、小、久、暂”等等变化。现分期概述如下：

## 一、清末民初

河套地区，从清王朝乾隆以后，由归绥（呼市）道萨拉齐厅管辖。由于当时套内垦地不多，人烟稀少，所谓管辖，也不过是遥领而已。

自绥远将军贻谷，振兴垦务以后，由于“套内水利渐兴、畝亩尽辟，而农民之生齿渐繁”①，

于是在光绪二十九年，分萨拉齐之西部后套地，在大余太设治五原厅（后移治于兴盛旺、再移治于隆兴长即五原）。在五原厅设治时，大余太设置“分司巡检”。一九一一年进入民国以后，五原厅改为五原县，“分司巡检”也同时裁撤②。

一九二四年冬，国民军莅绥以后，深以绥区设县过少为憾，于是于一九二五年，把包头与五原之间的后套东部地（即五原通济渠以东之地），置大余太设治局③。

在大余太设治局时期，其人员编制极少，除局长之外，设有文书、会计、事务以及其它办事人员而已。其第一任局长，于民国十四年五月份起，由大余太垦务分局局长张锡余兼任。张锡余卸任以后，改为委放制，其继任局长的顺序是：民国十五年四月王佑，十六年一月孙起凤，十六年十一月田思诏，十七年四月李成励，十七年七月魏治馨，十七年九月杨承愉④。

一九二九年，将大余太设治局，改为安北设治局，其管辖范围与大余太设治局时期大体相同。在大余太设立第一区公所，在贾泉湾设立第二区

公所，在套内桥湾设立第三区公所，每区各设十个乡。

安北设治局第一任局长邱文彬，于民国十八年一月上任。以后继任局长的顺序为：民国十九年三月郑桓武，二十二年一月齐寿康，二十四年十二月陈国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朱霁青担任东北总监，抗击日寇，因难以立足，于是率领所余部下，来到安北设治局第三区的和硕公中，建立了“东北行村”。嗣后他们又与山东来的一批青年汇合在一起（最兴盛时共达六百多人），把“东北行村”改为“农场”。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归、包等地先后失陷，日寇的铁蹄，踏入余太城。门炳岳的骑七师，李大超的游击军退入后套。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奉命镇守太原，转战晋西北一带。安北设治局局长陈国祯，因余太城失陷无法工作，由马七渡口过河，到山西投奔傅作义。

陈国祯走后，在局势突变，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地方上推荐张龙祥为代理局长（因处于战争年代，政权机构混乱，无正式委派手续）。张龙

祥于一九三七年秋季，在南昌一带与日寇周旋一度之后，进入套内第三区一带活动，冬季离职。

## 二、抗战期间

一九三七年，日寇占领大余太等地区以后，安北设治局的第一、二区，沦陷在日寇的统治骚扰之下，第三区仍在第八战区境内，形成敌我对峙的局面。

这年冬，乔学会在套内葛蛇担任支应局局长，负责为部队筹措粮草，支应差杂事务。门炳岳入套以后，感到安北设治局无人负责，对抗战不利，于是派乔学会执行安北设治局局长职务。

一九三九年二月，傅作义部由山西进入河套，在陕坝成立了绥远省政府并兼任了主席，乔学会仍任安北设治局局长，并把设治局设在扒子补隆（今新安镇）。当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设治局主要办理催收粮草，支应差务等事项，谈不到正常的施政工作。

一九四二年，绥远省在河套实行新县制，由原来的二县一局⑤扩为六县一镇，即：五原、临河、安北、晏江、狼山、米仓六县和陕坝一镇。



鉴于安北县大部分地区失陷，辖境太小，于是将五原县蔡家地到四柜以东的地区，划归安北县管辖。这时安北县实际管辖范围为通济渠、蔡家地、王柜以东，黄河以北，乌梁素海以西，乌加河以南。在今苏独崋乡及大余太乡的西水道一带，是敌我交错区。

实行新县制以后，乔学会任安北县县长。县政府设一、二、三、四科，负责承办民、财、建、教等工作，并把原县以下所设置的区、乡、间、邻制废除，按新县制规定划大乡为小乡，乡下设保、甲。乡所在地设中心小学，保设国民小学。从此，县政府直接管辖乡，乡通过保、甲完成各项任务。

一九四三年，乔学会调离安北县，由张玉璞继任县长。四四年张玉璞离任，由薛佩印接任县长，他坚持到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离职。

一九三七年日寇占领大余太以后，其管辖范围，名义上是东西二百里，南北五十里，西濒乌梁素海，东连包头、固阳，北与中公旗为邻，南与西公旗为界，而实际上仅能控制大余太城、南昌、台梁、后口子等主要地区和交通要道。其余

地区特别是在山区及乌梁素海北岸一带，经常出现八战区的军队和杂牌队伍。

一九三九年，日寇在大余太设立筹备处，着手建立“安北县公署”，隶属于“巴彦塔拉盟”。筹备处是由日本人山田恆任顾问，由东北蒙人佈和巴雅尔任处长。下设总务、警务二科，进行具体筹备工作。

在各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全部结束之后“安北县公署”正式成立。县公署的顾问（后改为参事），仍由山田恆担任，县长由佈和巴雅尔担任。

在县长之下，设民政、总务二科及警察大队等机构。民政科，掌管经费开支、财政收入、丈量土地、征收粮款、烟土以及管理教育等事宜；总务科，掌管后勤、杂务等事宜；警察大队设警备、警务二股，负责掌管人事、被服、军械、装备、弹药、发放良民证、搜集情报、看守人犯等事宜。在大队部下设警察署及第一、二、三中队。警察署担负城内治安、训练警察等责任；各中队负责维护驻防区的治安及警备等任务。第一中队驻防后口子，第二中队驻防台梁，

第三中队驻防南昌。

总括县公署约五十多人。警察署四十多人。警察大队三百多人。在各个大小机构中的正职，都由中国人担任。而各机构的顾问、参事、首席指导官、辅佐指导官、指导官等都由日本人担任。各级中国人官吏，必须在同级指导官的裁决下办事。

在县公署的基层，设置乡、镇、保、甲。大余太城附近为大安镇（后改为余勇乡），后口子一带为余智乡，台梁一带为余仁乡，小余太一带为余忠乡（后在高头梁一带设余信乡）。各乡、镇，设乡、镇长一人，文书一人，跑乡镇者二三人。各乡、镇遵照县公署的命令，通过基层保甲长，办理摊派粮款、收购烟土、发放良民证、支应杂差等事宜。

### 三、解放前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傅作义部三十五军属下的三十二师，首先向东挺进，接受敌人投降。从此，大余太结束了将近八年苦难奴役的生涯。

日寇投降以后，“巴彥塔拉盟安北县公署”

及其所有敌伪机构，全部撤销。除日本人到包头受降回国之外，其余一般伪职人员和军警等由八战区接收下来，经过整训，继续留用。

抗战胜利以后，安北县的地域又扩大到东西三百多华里，南北约一百华里。西从苏独崙西北南下，到土城子，与五原县为邻；南界由土城子顺黄河向东到蓊菱滩，隔黄河与杭锦旗毗邻；东界由西山咀北上，顺大，小余太川向东及东南延伸；南侧归西公旗管辖；北侧归中公旗所属；东南与包头接连，东北与固阳接壤。在上述辖域里，不但包括杭锦旗、达拉特旗、三公旗的飞地、插花地在内，而且三公旗之间管辖范围也错综复杂，所以在行政管理上，也只好依所辖范围交叉进行。

一九四五年冬，县长薛佩印离职，由陈质文任县长。县政府除设有秘书、会计、事务等人员外，还设有民、财、建、教科，田粮处以及司法、警察等部门。此外还设有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县团部、参议会、商会等机构。由于县境辽阔，特在日寇统治过的大余太地区，设立区公所，配备区长、助理员、区警等人员。

一九四七年冬，县长陈质文离职，由王元魁接任县长。县政府增设了地政科，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合并。各乡设指导员，由上级委派，乡长民选不支工资。此外，成立了地方武装自卫队。

一九四九年一月，县长王元魁离职，由冯铭汤接任县长。“九·一九”的前夕，县政府及所辖单位其他部门的情况是：县政府设秘书室、会计室、事务室、政务科（办理民政、教育、地政等工作）、财政科、建设科、军事科、田粮处、税务所，连同伙马夫在内共四五十人；警察局设局长、局员、督察员、巡官、警长、警察约二百多人；司法处设法官、书记员、法警十四五人；水利管理局设局长、副局长、股长约十几人；国民党党部和三青团团部合并后，设书记、执行委员四五人；参议会设参议长、副议长、秘书约四五人；商会设会长等二三人；邮电所四五人。至于地方武装，一九四九年一至三月份把自卫队改为清剿团，四至七月份改为自卫团，七月份以后改为保警大队。大队下设中、分队长，官兵约二百多人。

另外，继续在大余太设立区公所，配备区长、民、财、建、教等指导员，连同区警，共十儿人。在乌加河以北设大礼乡；在河套地区设太贞、太亨、太富、太安、太兴、太余、太有、太庆等乡；在大余太地区设余智、余仁、余勇、余忠、余信等乡。各乡乡长实行委派制，原设的乡指导员一律撤销。在乡长统领下设户籍、财粮、民政等干事以及乡警约十儿人。乡以下设保、甲，都系民选不支工资。全县共设三所完小，十三所中心学校，八所保办小学，七十多名教师，一千多名学生。

#### 四、解放以后

一九四九“九·一九”，绥远省光荣起义以后，人民政府对安北县旧职军、政等人员包了下来，继续留用。并积极开展思想工作，以逐步改变起义人员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之真正走到革命的道路上来。

一九五〇年一月，县长冯铭汤离职调到绥远省学习。

是年春，华北局抽调了冀中八分区一批有工

作经验的干部和山西老区的一批干部，到绥远省开展政权建设。绥远省政府又配备了些新参加革命的青年和起义人员，组成生产建政工作团，到各地区工作。当时给河套地区派驻绥西生产建政工作团，由河北沧县刘健带队，总团部设在陕坝。然后给五、安、晏三县，临、狼、米三县，分别派了两个分团。四月五日，五、安、晏分团又给各县派出了县生产建政工作团。其任务是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打消群众顾虑，组织发动群众大搞生产，与此同时建立新政权。

安北县的生产建政工作团团长为王正大，副团长张鸿恩、王锦云（后到），成员有若干人。这是解放后第一批到安北开展政权的工作人员。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安北县正式组成县人民政府，县长由张鸿恩担任，副县长由王锦云担任。原县政府军事科撤销。人民政府民政科长由李修身担任，其他人员稍加调整，无较大的更动。与此同时，中共安北县委员会成立，由王正大任书记（称政委），县委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及青年团、妇联等组织先后建立。

安北县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在生产建政工作

团深入农村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废保建政工作。即根据各村人口多少，距离远近等情况，把原设的乡、保、甲制废除，改建为将近一百个大小不同的行政村，行政村下辖若干自然村。另外建立了五个区公所：第一区设在新安镇，由李维宪任区长兼区委书记；第二区设在邓存店，由任德荣任区长兼区委书记；第三区设在黑泥池，由谢生有任区长兼区委书记；第四、五区（合署办公）设在大余太，由王桐林任区长，李修身兼办区委党务工作。

这年，把原警察局改为公安局。原警官继续留用当干部。原警察改编为公安大队，大队设指导员，大队长及三个排长，九个班长。公安局和公安大队共计一百多人。至于原保警队，解放以后改为解放军。原来号称二百多人，实际有一百多人。本年冬季五〇部队、蒙骑四师来安北县驻防时，调保警队到河北整改。

此外，这一年把银行、总粮库、供销社、卫生所、专卖公司以及文化馆分别建立起来。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一日，王锦云副县长到余太区下乡工作，在回县时，被原保警大队杨世



勋部下的叛匪，杀害于德岭山前红山口荒滩上。县委书记吴海以及通讯员郝瑞云同时被害。

一九五〇年冬，上级派李向克任安北县政委兼副县长。不久王正大政委调离，另有任用。当年冬季，主要开展减租反霸运动。

一九五一年夏，县长张鸿恩调到绥远省学习。由李向克一人掌管县政大事。是年冬，着重开展剿匪肃特及土改运动。另外，由县划拨土地，开始筹建兴胜、苏独崙、西山咀等劳改农场以及营盘湾劳改煤矿。

一九五二年春，开展三反运动。夏季，李向克调离安北，由王信继任安北县委书记，杨树森担任县长。冬季开展土改复查运动。另外，兴胜、苏独崙、西山咀等劳改农场以及营盘湾劳改煤矿基本建成。

一九五三年春，李修身任县委付书记，秋季调离。冬季在土改复查的基础上，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是年，为了便于督导基层，大力发展生产，将全县近一百个行政村改建成三十六个乡、镇。计有：新安镇、八号乡、六份子乡、树林子乡、

盐海子乡、稽菱乡、芦管壕乡、邓存店乡、北圪堵乡、居于圪卜乡、复胜乡、赵三圪堵乡、六大股乡、东土城乡、乃马岱乡、东河头乡、锡尼庙乡、黑泥池乡、大昌汉乡、北长胜乡、兴胜台乡、二小圪堵乡、西沙梁乡、天盛兴乡、余太镇、西水道乡、十五份子乡、苗二壕乡、南二十四份子乡、十四份子乡、南河湾乡、西羊场乡、十六堰子乡、白彦沟乡、千八营子乡、营家窰子乡等。后来各乡、镇先后成立了党支部以及群众团体组织。

本年，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解决旗县併存的问题。即把安北县境内乃马岱、锡尼庙属杭锦旗管辖的两个嘎查以及居住在付官圪旦、土城子一带的零散蒙民，完全以黄河为界，划归二区领导；把六份子、八号、盐海子属达拉特旗管辖的蒙民，划归一区领导（后盐海子蒙民又划归锡尼庙）。从此，既克服了杭锦旗、达拉特旗遥远跨县管辖的困难，且便于安北县就近领导解决纠纷。

随着形势的发展，本年成立了工商科、农业技术推广站、兽医站等机构。

一九五四年春，王信调职，由杨树森任书记，由范成卯、张涵任副书记，奇中山任副县长。这年除搞统购统销工作外，还为普选工作进行了人口普查，计全县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八户，五万五千零二十人。

是年，根据绥远省政府的指示精神，把三区的西沙梁乡、天盛兴乡划归中后旗；把四、五区所属各乡及一区的稽菱乡，划归乌拉特前旗；五原县把杨碾房划归安北县三区。经过调整划界以后，安北县剩下三个区二十一个乡，一个镇，还有九千零三户，三万六千七百九十人。

本年为了对乌梁素海加强管理，在撤销了四区建制以后，成立了水产局（区的编制），领导发动渔民搞互助合作运动。此外，县委增设了农牧部，政府设置了卫生科，各区成立了诊疗所，教育科改为文教科，还成立了干部文化补习班。

一九五五年元月孙才林任县长。冬季，在各乡成立了初级社的基础上，搞高级社运动。另外，政府成立了统计科，县所在地成立了食品公司、木材公司。

一九五六年夏，孙才林调离，由郝克接任县长。九月份杨树森、张涵调离，十月份由范成卯任县委书记，刘德奎、董富春任县委副书记。奇中山调离，洪济舟任副县长。

本年由河北、山西等地向安北县移民，计由河北安新县移来约三千多人，易县移来五十多户，阜平移来三十多户，涞源移来三十多户，分别安置在水产局和农业区生产劳动。由山西榆次专区移来青垦队二百多人，安置在北圪堵生产劳动。因这些移民和青垦队，不适应当地的生产、生活环境条件，先后又返回原籍，留下定居者不多。

是年，各乡普遍成立了高级社，县府所在地还成立了广播站（文化馆兼办）以及蓆包场。

一九五七年，县委副书记董富春调离，李志忠于六月、丁萍于十一月任县委副书记。本年主要搞整风反右、审干、肃反等运动以及进行整社大搞生产等工作。

这年，随着合作化形势的发展，乡需要划大，区的作用减小，由县直接领导乡，于是进行

了撤区併乡工作。全县併成新安、六份子、盐海子、树林子、新义、邓存店、乃马岱、锡尼庙、西小召、芦管壕、北圪堵、复胜、黑泥池、长胜、居子、大昌汉、大兴、兴胜等乡镇。从此，县政府又直接领导乡开展工作，为以后再扩乡和成立人民公社打下了基础。

一九五八年县委书记范成卯，县委付书记刘德奎、李志忠、丁萍，县长郝克、副县长洪济舟均在职。继续搞整风、反右、审干、肃反等运动。

同年，在教育事业上，设两个初中班，六所完全小学，二十多所初小，有一百一十九名教师，二千多名学生。另外约有二百多个民校班，能经常坚持学习者八十多个班，其中约有二十个高小班，成为学习文化和开展文艺活动的中心，并由县派专人辅导了一个重点业余剧团。

夏季，接上级命令，从四月二十二日撤销安北县行政区划併入乌拉特前旗，于是从五月份开始办理合并和交接手续。安北县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以上史料的撰述，不够详尽，且因过去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难免在某些方面上，有出入

之处，谨请知情者予以补充修正，以期准确完整。

〔注1〕见巴彦淖尔史料第二辑84页

〔注2、3、4〕见巴彦淖尔史料第二辑85  
页、227页

〔注5〕见巴彦淖尔史料第二辑86页  
附表二份

民国、日伪时期局县级职官表 表1

姓名	任事年月	职 衔	备 注
张锡余	民国十四年五月	大余太垦务分局局长 兼大余太设治局局长	广东南海县人
王 佑	民国十五年四月	大余太设治局局长	
孙起凤	民国十六年一月	大余太设治局局长	
田思诏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	大余太设治局局长	
李成励	民国十七年四月	大余太设治局局长	
魏治馨	民国十七年七月	大余太设治局局长	山西繁峙县人
杨承愉	民国十七年九月	大余太设治局局长	
邱文彬	民国十八年一月	安北设治局局长	
郑桓武	民国十九年三月	安北设治局局长	绥远丰镇县人
齐寿康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	安北设治局局长	绥远归绥县人
陈国祯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	安北设治局局长	绥远集宁县人
张龙祥	民国二十六年秋	代理安北设治局局长	
乔学曾	民国二十六年冬	安北设治局局长	
乔学曾	民国三十一年	安北县县长	
张玉璞	民国三十二年	安北县县长	
薛佩印	民国三十三年	安北县县长	

姓 名	任 事 年 月	职 街	备 注
陈质文	民国三十四年冬	安北县县长	
王元魁	民国三十六年冬	安北县县长	
冯铭汤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	安北县县长	
山田恒	民国二十八年	安北县公署顾问	日本人
林宽忠	民国三十年	安北县公署参事	日本人
高桥良泽	民国三十二年	安北县公署参事	日本人
钱川正	民国三十三年	安北县公署参事	日本人
侏和巴 雅 尔	民国二十八年	安北县公署县长	东北蒙人



### 建国后安北县级职官表

表 2

年 份	姓 名	职 务	书 记	副 书 记	县 长	副 县 长
1950年	王 正 大 李 向 克				张 鸿 恩	王 李 锦 云 李 向 克
1951年	李 向 克				李 向 克	
1952年	李 向 克 王 信				李 向 克 杨 树 森	
1953年	王 信		李 修 身		杨 树 森	
1954年	王 杨 树 信 森		范 成 卯 张 涵		杨 树 森	奇 中 山
1955年	杨 树 森		范 成 卯 张 涵		孙 才 林	奇 中 山
1956年	杨 树 森 范 成 卯		张 刘 董 德 富	涵 奎 春	孙 才 林 郝 克	奇 中 山 洪 济 舟
1957年	范 成 卯		刘 李 丁 德 志	奎 忠 萍	郝 克	洪 济 舟
1958年	范 成 卯		刘 李 丁 德 志	奎 忠 萍	郝 克	洪 济 舟

# 解放前乌拉特前旗 贵族喇嘛之间的权利斗争史

华吉日戈 撰写  
张世杰协助整理

## 一

乌拉特前旗（又称西公旗）过去，原系乌拉特三公旗的组成部分。其境内草场辽阔，山脉纵横。闻名全国的乌拉山横亘全境。山势巍峨高耸云霄，天然生长着的松、柏、杨、桦等树木，葱葱笼笼覆盖着整个山区。由于树木茂盛，形成了一个绿草如茵，鲜花似锦的大牧场，负载着千万只牲畜的繁殖生息。除此以外，山上还出产党参、黄芪等多种名贵药材，青羊、梅花鹿等，各种稀有野生动物出没林间。

涛涛黄河绕境流过，它灌溉着乌拉山南边东至图和木湖、塔本布浪，南至苏木吐、桑布黄盖，西至莫利套勒盖、稽茨滩、查干套海、毛力其格哈少，北至山脚附近等大片牧场。在乌拉山

以北，尚有明安川、余太、苏独崙呼都格、千里庙等广阔牧场。所有这些牧场都是水草丰盛、坦荡无垠，对发展畜牧业具有无比的优越条件。

交通运输极为发达，其境内铁路、公路、黄河航运纵横交错，这给市场的繁荣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带来极大影响。这种有利的条件是毗邻旗县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在旧社会由于地方封建势力的统治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榨，有利的自然条件从未得到应有的发挥，反而成为贵族、喇嘛相互割据，内乱混战的疆场。这样，严重地打击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给各族人民带来灾难。

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乌拉特前旗，气候温和，风景宜人，在这样优美环境里生活着的广大牧民群众，理应是六畜兴旺，农业兴隆，生活美满，吉祥如意地过日子才对。但实际却不然。由于蒙古人民头上世世代代压着封建势力与宗教统治这两座大山，因此，虽有山青水秀，得天独厚的良好自然条件，也无法改变牧民大众所处的贫困地位。特别是在进入三十年代里，前旗上层人物贵族、喇嘛之间，经常不断地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这就更使广大牧民处境日坏，生活也每况

愈下了。

王公喇嘛原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用以统治蒙古人民的政治和精神支柱。统治者只有通过王公喇嘛才能实现其统治内蒙古人民的罪恶目的。但他们利用王公喇嘛的方法多种多样、变幻莫测。有时拉拢，有时挑拨；有时分而治之，有时以夷制夷等等。请看三十年代发生在乌拉特前旗上层人物之间争权夺利斗争的闹剧中，背后都有他们在作怪。

所谓乌拉特三公旗者，原是这三个旗的统治者，在清朝时代同被皇帝封为“公”爵。而前旗的统治者被授为“镇国公”，因位于乌拉特之西，所以称为西公旗，亦称前旗。本文中提到的王公，实乃对蒙旗统治者笼统的称呼，而在前旗实乃有“公”而无“王”。

在宗教方面，全旗共有寺庙二十四座。在这些寺庙之上有一个旗庙。旗庙对其它寺庙有宗教上的领导权。当时前旗的旗庙为梅力更庙。该庙建立在哈叶胡同北山梅力更沟，是一座具有西藏建筑风格、富丽堂皇的大庙宇。当时庙上共有七个活佛喇嘛，其中以梅力更活佛的地位为最高。

各寺庙都有自己的土地和畜群。所有这些庙产，都由活佛喇嘛来支配，这已成为活佛们的特权，甚至连旗扎萨克对之也无权插手或过问。

宗教是吗啡剂，是鸦片烟，它是套在蒙古人民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千百年来，蒙古民族由于信仰喇嘛教，不仅造成了人民的愚昧落后，也更招致了民族人口的急剧下降。

总而言之，解放前蒙古民族“贫、病、愚”的主要根源，都是和封建统治与宗教信仰分不开的。在前旗来说，又加上贵族与喇嘛之间的无休无止地权利斗争以及长城自毁，引狼入室的自杀作法，更造成民不聊生，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 二

在二十年代时期，执掌前旗旗政充当扎萨克的原为贺喜格德力格尔。可惜他有福无寿，不幸早亡。贺喜格德力格尔生前无子，因此，在他死后，旗扎萨克的职权由协理文书额尔和道尔吉（额宝斋）代行了几年。

及至二十年代中期，额尔和道尔吉觉得不能

再长期代理扎萨克职权了，于是他就开始在全旗贵族台基中物色扎萨克人选。经过精心选拔，终于物色到了在公庙子出家当喇嘛的台基石拉布多尔济，有资格充当旗扎萨克。在人员选定后，经报请乌兰察布盟盟长和绥远省政府批准，任命石拉布多尔济为乌拉特前旗扎萨克，执掌旗政。

石拉布多尔济在受命后，立即还俗，然后就任扎萨克职位，执掌了旗政。石拉布多尔济本为“贝子”爵，但后来在一些文件中有时称他为“石王”。这是一些人不了解蒙旗情况，误以为凡当旗扎萨克者一定都是王爷，因此，随便给石拉布多尔济加以“王”称，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石拉布多尔济执政后，马上娶了一妻，名叫孟根其其格。但婚后数年，女人并未生育。为了后代子嗣计，他又在达拉特旗娶来名叫花儿的女人为次妻。自从花儿进门以后，石拉布多尔济厌旧喜新，与花儿打的火热，反而逐渐地疏远了原配夫人。不久，其大妻忧郁而亡。从此，石拉布多尔济无所顾忌，每天与花儿吃喝玩乐，不理旗政，以致大权旁落在一些旗府官员

手里（主要落在额尔和道尔吉手里，他把持旗政前后约三十年）。他们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从此，旗内人民的生活更陷于困苦不堪的境地。

自从石拉布多尔济登上旗扎萨克的宝座后，他不仅沉湎于酒色，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同时，并又征集工匠、人伙、大兴土木，在乌拉山敦达高勒（东大沟），修建起大批宫殿式的房屋。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奴隶当差制。令全部奴隶分期分批的无偿的来衙门服劳役。如背柴、放牧、挤奶、背水、做饭等等。每月轮换，定为常规。

为了保护他和他全家的身家性命，他特地在牧民中选出了身强力壮的青年二十多人，组成卫队，日夜守护在他的身边。

石拉布多尔济原因无子才娶花儿为次妻，但几年来，花儿宛如石田一块，并未开花结果，没有给石拉布多尔济生出一男半女。鉴于此种情况，在属下们的劝告下，石拉布多尔济又娶了第三房女人。

这个女人汉名叫奇俊峰，蒙名色布勒玛。其母原为阿拉善夫人。后嫁到达拉特旗，人称为阿拉善夫人。奇俊峰为其养女，系达拉特旗人，其娘家

住在五原西边的西仓。从奇俊峰进门后，石拉布多尔济一反过去喜新厌旧的故态，他仍然亲近花儿，对奇俊峰感情淡薄，关系疏远。致使奇俊峰不得不长期住在娘家。一直到石拉布多尔济临死前，才回到石家来。

尽管石拉布多尔济娶妻三人，但都未曾生育。后来又在一九三六年间，娶了一个乃玛斤为四妻，也没生养。当年秋，石拉布多尔济就逝世了。

### 三

当时，乌拉特前旗的形势是，虽然在名义上石拉布尔多尔济为旗扎萨克，是一旗之长，但实际上他却不能在全旗范围内行使他的全部权力。原因是：官府和寺庙的势力已经强大，形成了割据一方，进而与石拉布多尔济相抗衡的地步。这些官府、寺庙都拥有大量土地，进行收税吃租，在府、庙里，他们也设官分职，如任命德木其、控热巴（寺庙的管事、保管）、管家、会计等职务，为他们经营管理府、庙大事。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官府、寺庙都从所属奴隶中抽



出壮丁，编成军队，用以保卫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

当时，全旗势力最大的官府，寺庙有三个，这就是：额尔和道尔吉官府，梅力更庙活佛喇嘛，公庙子大喇嘛达格丹（亦叫迪克丹）。寺庙都住在乌拉山南面的山脚下。由敦达高勒往西二十公里处为大喇嘛达格丹居住的呼之宝力格，往东二十五公里处为梅力更活佛居住的梅力更沟口的梅力更庙。至于官府额尔和道尔吉则住在三湖河畔。

梅力更庙在清王朝时期，曾被皇帝赐名为“兴旺宗教庙”。因此，这座寺庙在全旗声望最大。在宗教界也享有特殊的待遇，及至传到第八代活佛——也就是最后一代活佛时，寺庙的土地，牲畜数已达到很可观的数字，而庙里建立起来的军队和装备也比较精良。

由于官府和寺庙的势力逐渐强大，旗扎萨克石拉布多尔济的权势不断地受到挑战，终于发展成错综复杂的权利斗争，并进而形成火拼的局面。致使旗政日非，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从现象上看，矛盾的起因很多，但引起石拉布多尔济与官府、喇嘛之间发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一个权利问题。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按照前旗惯例，寺庙财产有自主权，旗扎萨克是不能向寺庙土地、畜群收税的。可是当时梅力更庙拥有土地八百顷，牲畜若干群。石拉布多尔济对于这些庙产垂涎欲滴，眼里冒火，竟然提出了违犯惯例的要求。当时他要求从梅力更庙的收入中征税。对此，梅力更活佛严加拒绝，从而双方闹翻了脸，后来竟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斗争局面，结束了以前封建贵族与寺庙喇嘛的和平友好关系。

（二）达格丹大喇嘛是石拉布多尔济的堂叔父。达格丹之亲兄达汗官府死后，其子巴图巴雅尔充当右协理，但有名无实，没有实权。达格丹大喇嘛深切希望前旗扎萨克的职权掌握在自己亲姪儿巴图巴雅尔之手，但经过暗中努力，始终未能如愿，因此，他把石拉布多尔济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不过达格丹准备推翻石拉布多尔济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由于采取的方法十分隐蔽，所以矛盾尚未公开化。

(三) 额尔和道尔吉与石拉布多尔济是导致矛盾公开化的肇事者。主要原因是由于额尔和道尔吉的长子曼头与花儿私通。详情如下：

一九三〇年初，额尔和道尔吉居住在三湖河畔自己的家中，他除了靠收土地租税过活外，自己也养了一群牛，由于他身为官府，身边也有几十名卫兵保护，由其长子曼头率领。

在三湖河畔有石拉布多尔济的敖特尔（流动放牧的倒场），距额尔和道尔吉住处才一里来路，互相都能看得见。每年秋天石拉布多尔济都到敖特尔里来。这年他又带上花儿夫人住在敖特尔里。

此时，曼头每天都在三湖河畔游荡，表面上在打鸟，实际上他是在打花儿的主意。花儿经常也到三湖河边出游，与曼头常常会面。久之，男有情女有意，两人遂定私约。一九三三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花儿忽然打发了环来叫曼头到她家。曼头喜出望外，立即穿上大衣，佩上手枪走去与花儿会面。正当他们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的时候，不料好事多磨，在午夜时分，忽然来了几个人，从花儿房中拖走了曼头，并没收了他的手枪

和外衣，把他关在一间空房中。幸亏门上沒有上锁，因此，在天亮之前，曼头安然逃回了家中。

这天，石拉布多尔济正在去梅力更庙拜佛的途中住宿。次日清早正准备出发之际，忽然，看见府内的管事人员巴图乌力吉等人跪在面前，手捧曼头的枪支和衣服，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当时石拉布多尔济并未表示态度，依然带上从人去梅力更庙拜佛去了。及至由梅力更庙归来后，他唯一的措施是：把原捕获曼头的人加以痛打，并把他们赶了出去，借以自慰。

#### 四

花儿夫人与曼头私通被揭露后，奇怪的是，此事似乎无人过问。即石拉布多尔济并没有责备其妻的不忠；而协理额尔和道尔吉也未对其子的犯上行为作任何处理。表面上看来，非常平静，此事似乎不了了之。其实不然，背后正孕育着一场杀机，最后终于爆发了导致全旗分裂与垮台以及连绵不断的自相残杀。

为什么石拉布多尔济没有立即处理曼头呢？这是因为额尔和道尔吉身边备有重兵，并由曼头

率领，如仓促处理，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如不惩罚曼头，胸中之气又十分难耐。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来，他马上派人告诉额尔和道尔吉，让他立即交出枪五十支，马五十匹，用以赎曼头之罪。实际上他打算在额尔和道尔吉交出枪马后再抓曼头治罪。

这时曼头早已逃奔外地躲避去了，只有其父额尔和道尔吉在家。当他听到石拉布多尔济提出的要求后，感到这是一个卡脖子的阴谋诡计，对之气愤异常！当即回答“关于花儿与曼头之事，他们双方都有责任；要处罚的话，男女两方都要受到处罚才是。现在抛开花儿不问，单独向我要枪、要马，这是不公平的，我万难接受”双方僵持，互不让步。从此，石拉布多尔济与额尔和道尔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发展到了兵戎相见。

在石拉布多尔济要求被拒后，他并不甘心于失败，随即在旗府内召集军政官员色林保、沙格得尔、满海、斯日古楞等开会，商讨对策。会上有人提出：“必须给额尔和道尔吉以武力打击！”另有人提出：“如果用兵力打击额尔和道

尔吉的话，万一梅力更活佛和达格丹大喇嘛等三方面的军事联合起来向我反攻，那我们所处的地位将十分不利！”最后有人提议说：“我们的扎萨克是一旗之长，能够统率全旗军队。我们应该一方面征调全旗军队助战；另一方面包头城防司令王靖国与扎萨克关系很好，还可以请包头驻军作我们的后盾，以压倒对方。”等等。

敌对情绪越来越严重，各方都在秣马厉兵，进行备战。到一九三三年末，双方部队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石拉布多尔济首战告捷，他们不仅打了胜仗，而且还俘获了额尔和道尔吉的牛马群，成为胜利者。

额尔和道尔吉战斗失利后，立即重整军备，进行报复。他一方面把妻子儿女送到公庙子达格丹大喇嘛府内居住；然后，他会同达格丹大喇嘛一同去巴图哈拉格（百灵庙）请求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给予支援。

一九三五年夏天，包头城防司令王靖国派步兵两个团协助石拉布多尔济来西公旗打内战。王靖国原为阎锡山的亲信人物，曾当过十九军军长。其后阎锡山派他来后套开垦蒙古土地，称为

垦务督办，此时正任包头城防司令，兼指挥后套一带的兵力。由于王靖国派兵助战，这大大的鼓舞了石拉布多尔济的士气。他立即组织起全旗蒙汉部队与王部两团协同作战，进攻以公庙子为基地的达格丹大喇嘛府，并准备趁机全部歼灭达格丹和额尔和道尔吉的兵力。

当时大喇嘛达格丹和额尔和道尔吉的兵力相加起来还不到一百人。由于兵力悬殊，只能守，不能攻。尽管石拉布多尔济的部队不断用机关枪、迫击炮射向大喇嘛府，但在大喇嘛达格丹和额尔和道尔吉的指挥下，士兵们都死守在阵地，一直继续抵抗了三天三夜。达格丹等为了坚定士兵必胜的信念，还搞了一些迷信活动，如请来大坝庙的神官喇嘛高日德木进行作法，以诅咒敌人的早日灭亡。

在战斗进行的第三天晚上，大喇嘛府遭受的炮弹越来越多，此时妇女小孩们哭喊连天，失去了信赖，就连指挥战斗的大喇嘛和额尔和道尔吉也感到胆战心惊，不敢再战。而那个依靠法术专门哄人的高日德木，不知何时早已逃得无踪无影了。

在这危急关头，达格丹大喇嘛和额尔和道尔吉决定立即逃走。否则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于是他们带领兵丁、家属、骑马赶骡，拼命冲出包围，向东北方向逃去。一进公路，他们就往西拐，顺西山咀的边上向西走，直奔杭锦旗却木楚克的住所而去。此时他们的部下奔走逃亡，只有少数人跟他们来到却木楚克家中。那个神官喇嘛，也在逃跑之中失足落水，一命呜呼了。

在这次战斗中，石拉布多尔济和他请来助战的王靖国两团兵是胜利者，他们在大喇嘛达格丹和额尔和道尔吉逃走之后，乘胜攻入大喇嘛府，大肆抢掠，搜刮金银。最后把所有的畜群，都作为胜利品一群一群地赶回去了。

这次战斗尽管打的十分激烈，但双方部队死亡的人数并不多。

## 五

却木楚克家住杭锦旗塔本萨拉（五岔沟），原是杭锦旗里有名的大剥削者。当时他任营长职务，驻在杭锦旗东特布地方。大喇嘛他们兵败来投后，他愉快地收容了这些失败者。大喇嘛达格



丹和额尔和道尔吉在安顿好家属及残兵败将后，又双双东去百灵庙，向德穆楚克栋鲁普请求支援。

这次德穆楚克栋鲁普答应了大喇嘛他们的请求，除拨给他们步枪五十支、子弹若干发以外，又派出以连长霍仁格为首的一连兵力给予支援，这一连兵约有百十人，都是从察右旗招募来的。随同这个连一同来的尚有蒙古自治政府官员十来人（大部分是汉族），并带有电台一部，经常与百灵庙取得联系。大喇嘛他们返旗后，将这连兵安排驻在梅力更庙上，然后回到呼和宝力格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准备伺机再战。

在大喇嘛他们失败的时候，却木楚克确实对他们帮了大忙，恩重如山，无以为报，额尔和道尔吉情愿将自己唯一的女儿敖特恆查干嫁与却木楚克之子为妻。从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更近一层，而额尔和道尔吉的家属由此更得到却木楚克的妥善安置。为安全起见，却木楚克把他们送往杭锦旗最西部的一个偏僻地方去住。额尔和道尔吉在安排好家属后，又立即率领长子曼头、三子巴亚尔图一块到梅力更庙会同霍仁格征兵备战，准备

大干一場。

蒙古军进驻梅力更庙，构成了对石拉布多尔济的更大威胁。为对抗计，石拉布多尔济又从包头王靖国处请来三个连的兵力，分别驻在包力召海（汉名堡子湾）、巴音宝力格等地方。这时双方已完全进入对峙的局面。

在这兄弟阋墙，引狼入室的情况下，乌拉特前旗人民更加深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仅出钱、出物，还得给交战者双方提供炮灰，以供他们自相残杀。此时，广大牧民情绪低落，生产下降，在精神状态方面，已经陷入麻木不仁的地步。

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歌谣，颇为人民所喜爱。大意是：

乌拉特西公旗哟，麻烦成堆。

日后如何哟？谁能先知！

树枝上落了布谷鸟，

领上咱子弟呀！上呀，上战场；

树枝上落满了相思鸟，

留下咱亲友呀！上呀，上战场。

黄河岸上柳树在摆，

望着那恋人呀！上呀，上战场。  
绿湖边上鸿雁在叫，  
离开那家乡呀！上呀，上战场。  
柳树林的雀鸟自由飞翔，  
我们老百姓呀，有谁来救？

不仅老百姓生活如此，就连额尔和道尔吉亲生的唯一女儿敖特恒查干也未逃出当作政治牺牲品的厄运。敖特恒查干原本是一个善良、美丽、温厚、和蔼的好姑娘，但她的父亲却把她当作报恩的礼物，嫁与却木楚克之子为妻。由于男女双方没有爱情基础，以致造成婚后夫妻反目，公婆虐待，敖特恒查干每日都处在以泪洗面的忧郁、悲伤、烦闷、孤独的生活中。日久生病，不久病魔便夺走了她的生命。

敖特恒查干生前深深地怀念家乡，曾编一歌，以寄乡思。歌词缠绵凄凉，委婉动人。大意是：

山川富饶哟，  
乌拉特地方。  
牛羊肥壮哟，  
老人的福气。

阿爸要是问我哟，  
女儿在这里安好。  
绣起那灿烂的金莲花哟，  
献给亲爱的父亲。  
额吉要是问我哟（额吉是母亲），  
女儿在这里安好。  
绣起那美丽的牡丹花哟，  
献给亲爱的母亲。  
我从苍翠的乌拉山脚下，  
来到了荒凉的杭锦旗，  
思念亲爱的父母哟，  
唱起我心中的歌曲。  
敖特恆查干儿哟！  
我想念家乡乌拉特前旗。  
今年要是回不了家哟，  
只能在此地永息！

## 六

一九三六年，这一年对乌拉特前旗说来是一个多事之年。这年春天，住在梅力更庙的梅力更活佛、额尔和道尔吉官府和住在呼和宝力格的达

格丹大喇嘛都抓紧时机，在附近各苏木征兵，以充实力量，准备伺机夹攻石拉布多尔济。驻在梅力更庙上那连蒙古军，也在连长霍仁格指挥之下进行备战。霍仁格为人残暴，动不动就鞭挞士兵，性格极坏。

一九三六年农历七月间，在一个浓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这时天空还在滴着雨点，额尔和道尔吉协理和梅力更活佛紧急集合起他们所有的兵丁约一百二十多人，命令额尔和道尔吉部由沙日门率领，梅力更活佛部由洪克尔率领，让他们冒雨向西奔袭。梅力更庙则由霍仁格连守护。

原来这两支冒雨奔袭的队伍，今夜是执行捉拿石拉布多尔济得力助手满海的任务。满海当时身为旗府总管，是石拉布多尔济身边出谋划策的军师谋士，也是官府、喇嘛的死硬对头，因此，官府、喇嘛们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部队从梅力更庙出发后，一直朝西走，及至走到乌宝力格南边哈少敖包附近，就拐入一片玉米地里，士兵都下马步行到乌力吉沟口的东边。当时由沙日门指挥将马匹放在此处。让大部分士

兵步行去乌力吉沟口捉拿满海。

在旗内经常发生内战的情况下，人人都感到自危。身为庙府总管的满海，也时刻提防着敌人的暗算，因此，他家也住着十来个士兵，用以自卫。是夜站在山头的岗哨正在抱枪打盹之际，突然遭到沙日门率领之兵的偷袭。当哨兵被俘后，沙日门命令他充当捉拿满海的向导。

到了满海家后，他们很顺利地收缴了卫兵的武器，并未遇到任何抵抗。及至进行清查被俘人员时，才发现并没有满海其人。原来满海此时已去后套，不在家中，故未遇险。未捉到满海不好回去交差，于是沙日门决定捉拿满海之弟官布，以便回去报帐。

官布家住在尔计沟里，与满海家相距二里之遙，家中也驻有军队自卫。沙日门兵分两路，分别占领东西两座山头，准备以泰山压顶之势袭击官布。在天色黎明时分，两路人马都已爬到山顶。此时西路登山士兵不慎登落一块石头，滚到山下，恰被一早起大便的牧民所发现。他抬头一看，满山是兵，便知大事不好，提上裤子赶忙回去报告。及至走到院内，看见一个穿红袄，秃头

的大胖子早已发现敌人，正在拿枪向东西两个山头射击。双方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激战，那个秃头胖子不见了，驻在官布家东厢房的卫兵们，也从窗口把枪扔了出来，全部举手投降了。在打扫战场中，才发现那个秃头胖子就是官布，其妻也死在官布身后。因为枪声一响，其妻惊慌失措，紧紧拉住官布的后衣不放，结果与官布一同中弹而死。

## 七

按“兵贵神速”的要求来讲，沙日门在消灭官布之后，应立即进军三湖河，在石拉布多尔济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是能够一举消灭敌人，获得全胜的。但沙日门目光短浅，虑不及此，竟在吞云吐雾中，贻误了战机。结果功败垂成，反而造成了大喇嘛达格丹祖孙三代被杀的惨剧。

原来沙日门在消灭官布一家之后，又回到乌力吉南边的村庄里休息兵马。进村后，他除了下令设岗放哨外，马上点着烟灯，吸起大烟来了，在他迷迷糊糊之中，早已把消灭石拉布多尔济的任务忘到九霄云外。等到次日傍晚率兵出发时，

时间早已过了两天一夜，战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包头驻军王靖国已派出大批军队占领了梅力更庙，赶走了梅力更活佛和蒙古兵。并断了沙日门他们的归路。

原来沙日门杀害官布一家的消息，当天就传到了石拉布多尔济耳中。他听到噩耗之后，心中万分惊恐，马上带上护兵连夜去包头求援。对此，王靖国非常慷慨，立即答应派一师兵力帮助，并约定采用东西夹击的办法，以消灭官府和寺庙的势力。这就是由包头出兵向西攻，由五原出兵向东进。

当沙日门在听到王靖国出兵助战的消息后，吓的呆若木鸡，他不敢西进，立即返师。在他们走到东乌宝力格深山里的时候，迎面来了被王靖国部队赶出来的霍仁格的一连蒙古兵。此时，沙日门感到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只好率部会同霍仁格一同去百灵庙，加入到蒙古军中。

自沙日门走后，王靖国布置的东西夹击计划，已在步步紧逼，厄运首先降落在大喇嘛达格丹头上，因为夹击部队从东西两方会合在呼和宝力格，大喇嘛达格丹府是他们进攻的重点。大敌



当前，走为上计。此时大喇嘛达格丹除命令几十个士兵前去抵挡头阵外，他自己带上全家老小（其兄大汉官府的家属）觅路而逃。

当大喇嘛达格丹全家沿着呼宝力格沟，走到山顶脑光朱鲁格一带的时候，正好遇上石拉布多尔济与王靖国部队的拦击。大喇嘛达格丹首先被人用枪打死，然后又割下了他的脑袋，接着又打死了躲在树后的达格丹的侄儿巴图巴雅尔。这时巴图巴雅尔十一岁的小儿子阿木尔楞贵正和一个老喇嘛在树林躲藏，也被石拉布多尔济的部队搜寻出来，在他们脱下裤子验明是男孩后，当即连同老喇嘛一并枪决。在这场战斗中，大喇嘛达格丹祖孙三代惨遭杀害，而家产、畜群也被掠夺殆尽。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大喇嘛的家人衣食无着，只好过起了流浪生活。

## 八

呼宝力格一仗，石拉布多尔济借助王靖国军队的力量大获全胜。此次战斗，打死了大喇嘛达格丹的祖孙三代，并割回大喇嘛的人头充当胜利品，除了一大隐患。原来在这次战斗中，为了

彻底消灭官府，喇嘛的势力，王靖国实际上共出动了两个师的兵力，东西夹击了大喇嘛。他除在包头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占领了梅力更庙，并扫荡在东部的一些官府、喇嘛的势力外，又特派五原驻军门师长，率领全师人马东下呼和宝力格，彻底、干净地消灭了大喇嘛达格丹。

当胜利消息传到住在包头的石拉布多尔济的耳边时，他欣喜万分！认为大敌已除，太平无事，便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乡。

早在战斗开始之前，石拉布多尔济曾对其部下说：“在战斗中谁要能杀死大喇嘛达格丹，并将其人头带回来的，我必有重赏！”及至抵达家乡后，士兵巴图乌力吉带上大喇嘛的人头向石拉布多尔济请赏。自言大喇嘛是他打死的。人头是他亲自割下的，请按功授赏。

当石拉布多尔济看到巴图乌力吉从麻袋倒出来大喇嘛的人头后，只吓的魂飞魄散，目瞪口呆！厉声问道：“你拿这个来做什么？赶快把它丢在河里去！”这样巴图乌力吉不但没领到赏，反而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地把大喇嘛的人头丢进了三湖河。

石拉布多尔济与大喇嘛达格丹本为一家，同属于贵族台基，论辈份大喇嘛达格丹还是石拉布多尔济的堂叔。自从石拉布多尔济看见叔父达格丹的人头以后，由于骇怕惊吓，神经上受了很大刺激，夜间经常在梦中惊醒，并不由自主地胡言乱语遂酿成神经病，不能处理旗政，只得把旗里行政事务交给沙格德尔、色林保、满海、斯日古楞、官其克巴自尔、那顺巴特尔等旗府高级官员去处理。他自己带上家属去包头治病。

石拉布多尔济原本是喇嘛出身，宗教信仰虔诚。自到包头治病后，除每日延医吃药外，在空闲的时间里，他都念《阿拉旦格日勒经》，乞求佛爷保佑长命百岁。尽管如此，但他的病并无好转，始终觉得大喇嘛达格丹的人头不停地在眼前晃来晃去，致使病情日重一日。

一日，他正在颂经之际，丫环突然从里屋出来说：“花儿夫人昏迷不醒，已失去了知觉。”石拉布多尔济赶紧进屋呼唤不应，及至请来医生时，花儿夫人早已死去多时了。原来是石拉布多尔济痛骂花儿夫人与曼头私通，大伤其花儿自尊，可能由于羞愧她吞咽金戒指丧命。

花儿夫人死后，石拉布多尔济不胜悲伤，这更加重了她的病情。为了寄托他的哀思，对花儿夫人的殓殓和葬埋，花了不少钱，丧事办得极其体面。事毕，他立即返回三湖河的敖特尔，并从娘家叫回来奇俊峰夫人。

奇夫人回家后，发现石拉布多尔济身体消瘦，面目全非，并且性情古怪，精神萎靡不振，睡眠不好，饭量不佳，经常在夜间跳起高喊：“大喇嘛拿着锁链来了！”府内管事人员到处烧香拜佛，请喇嘛念经，送“替死鬼”，等等，但都无济于事。终于在一九三六年秋季病死于家中。

## 九

尽管石拉布多尔济娶妻四人，但在他生前都没有生育出子女来，石拉布多尔济常为身后无人接替职权而心中烦闷。及至奇夫人归后不久，向府内管事人员透露，她已身怀有孕，以图博取石拉布多尔济的欢心。

一九三七年夏，居住在包头的奇夫人已届临产之期。这时伺候在她身边的奴婢和色林保的女人，早已为奇夫人的生产作好了准备。经过一番

折腾，终于在午夜时分，奇夫人生出个男孩来，取名叫阿拉腾敖其尔，为石拉布多尔济留下了后代。奇夫人生子后，自己没有奶水，小孩靠牛奶养大。

关于这个孩子的来历，当时议论纷纷。如说：“奇俊峰和石拉布多尔济结婚多年没有生男育女，为什么偏在石拉布多尔济身死之后生下孩子呢？”由于持这种疑问的人占大多数，因此，这事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

后来，奇夫人的一个贴身丫环向人透露了这事的秘密。她说：“奇夫人鉴于其夫无子，怕事业无人接替，财产无人继承，这将丧失石拉布多尔济家的产业、权势。因此，奇夫人在石拉布多尔济死后，即身缠棉花，装作怀孕，并早在石拉布多尔济临死前放出风声，以安人心。然后在第二年夏天，从包头（现东河区）西门内王大人巷姓田家抱来一新生男婴藏于密室，最后她才演出一场假生孩子的喜剧来”。云云。

据了解内情的人说：“此事主要由色林保之妻（即后文中郝游龙之母）协助完成的，她对奇夫人演出的假生子喜剧，出了大力，帮了大

忙。”

流言不胫而走，几乎人人皆知，事关石拉布多尔济后人的袭爵接替问题，对此，旗府官员应该认真地进行调查，并将真象公布于众才对。但此时，他们正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此事置若罔闻，未加过问，以致这件事情，直到今天还是疑问。

## 十

自从呼和宝力格战斗失败后，额尔和道尔吉和梅力更活佛又逃到百灵庙。他们本打算请求德穆楚克栋鲁普出兵支援，及至到百灵庙以后，看到的，听到的，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他们认识到，在国家多事之秋，乌拉特前旗的事情也不是孤立的，它与国家民族的形势都有联系，只有国家安定，乌拉特前旗才能有前途。从此，他们把个人之间的恩怨暂时搁置下来。

为此，额尔和道尔吉和梅力更活佛将他们由前旗带来的兵马，计有：大喇嘛达格丹所属的官其格斯仁部，额尔和道尔吉所属的沙日门部，梅力更活佛属下的洪格尔部，全部交给了当时的蒙

古军。然后，他们到了归绥市（呼和浩特）席里图召（庙）当寓公，在那里座待形势的变化，以定以后的行止。

不久，便发生了百灵庙事件。这就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傅作义所属的三个团进攻已成为蒙政会所在地的百灵庙。此时，蒙古军奋勇反抗，原乌拉特前旗加入蒙古军的三部分人马也都参加了战斗。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及至进行到午夜时分，傅作义部队已占了绝对的优势，而蒙古军则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此时，由乌拉特前旗来的官其格斯仁、沙日门、洪格尔三人，感到大事不妙，便率领三部分人马，朝百灵庙东北的方向逃跑了。

中途，洪格尔感到前途无望，乃带领少数随从人员，离队逃往东公旗去了。官其格斯仁和沙日门二人率部一直逃到四子王旗的旗庙——锡喇木伦庙才停止前进。随后蒙古军也陆陆续续逃到此庙。当时德穆楚克栋鲁普命令他们原地待命，伺机反攻。因此，官其格斯仁和沙日门两部官兵也住在此庙未动。

不久，又来了王英所属的军队二千多人，还

有日本顾问二十余人，也住在锡喇木伦庙上。他们每日乘汽车去百灵庙，晚上回来，据说与傅作义部队在作战。后来传出“汉兵可能要叛变”的消息。对此，官其格斯仁向沙日门二部都加强了防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即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晚间，按宗教规定这天都要点佛灯、颂经、烧香，用以纪念佛祖宗喀巴。此夜锡喇木伦庙佛灯点点、烂若明星；经声朗朗、悠扬悦耳，吸引了许多游人（主要是士兵）。

夜半过后，当沙日门正在吞云吐雾大过烟瘾之际，突然听到了枪声。他到院里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后，又回到屋里吸烟。此时官其格斯仁也来到院中指挥作防御准备，枪声逐渐密集起来，只听寺庙各胡同中人马纷至沓来。有军号声，人喊声，呻吟声，狗叫声混杂交织在一起，使整个寺庙形成了一片混乱景象。

黑暗中，忽见院内一人跌倒。原来是连长官其格斯仁前额中弹当场死去。挨至天明以后，院内士兵都集中在喇嘛的柴（牛粪）房内躲避，惟不见沙日门前来。及至寻到蒙古包一看，他早中弹死



亡多时了。当太阳露头时，哗变士兵枪口对准了柴房，全部士兵只好举手投降，其中只有额尔和道尔吉的三子巴雅尔图和乌力吉巴雅尔二人化装成喇嘛逃走。

原来这次哗变是王英部下旅长石玉山、金宪章二人发动的。他们在投降日寇后，屡吃败仗，感到前途无望，同时又受傅作义的策反，遂发动了哗变。哗变中杀了日本顾问二十多人，然后起义投奔了傅作义。

## 十一

乌拉特前旗经过一九三六年三个月的互相残杀，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此时在乌拉特前旗这座政治舞台上，反而显得十分平静。

奇俊峰夫人生下男孩后，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因此，她带了小阿哥阿拉腾敖其尔（阿哥系对王公儿子的尊称），大摇大摆地回到了敦达高勒。由于阿哥幼小不能亲政，于是奇夫人便把全旗军政大权统统揽到自己的手里。她为了取得贵族官府的支持，便封官许愿，使一些人都得到了升官发财。如色林保、沙格德尔当了协理，其他

人也当了梅林章京、甲喇、参领等。（相当于科、局级和区乡级干部）

住在归绥市，投靠德穆楚克栋鲁普的额尔和道尔吉协理，这时看到前旗政局已变，人事全非，遂打动思乡之念，乃派亲信参事梅林章京太保到奇夫人处谈判，愿“捐弃前嫌，和平共处。”奇夫人表面上同意，但内心还有怀疑。于是她秘密派人去调查了解额尔和道尔吉的行为和动向。

正在双方猜疑、互不信任的时候，突然发生了额尔和道尔吉之子曼头、巴雅尔图等八人的被惨杀事件，致使刚出现的美好前景，顿时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巴代原为前旗士兵，后编到蒙古军，在霍仁格手下当排长，驻防在固阳北边阿拉坦山一带。当时他想去杭锦后旗叫回额尔和道尔吉的长子曼头、三子巴雅尔图，让他们重新组织兵力，他本人也准备把自己的一部分兵力拉回故乡来，一同大干一番。

思谋已定，他便请假带上三个随从回到家乡。在家里住了几天，曾到奇夫人府上作过客，而

后带随从四人（由他家中跟来一人），渡过黄河奔杭锦旗而去。为了躲避途中防卡的盘查，他们绕了不少的路才到了曼头家。见面后，立即把事谈妥，并决定马上返回前旗。

太阳落山时，他们由曼头家动身。这时曼头弟兄带上四个人（内有一名汉族）和巴代五个人，一行共十一个人，快马加鞭，一夜就跑了一百二三十里路，在天亮的时候，跑到了西山咀以西五六十里处的一个制鞋厂里休息。

次日傍晚，正当曼头他们备好马，准备出发之际，忽闻狗叫声，发现有人从东北方向徒步而来。岗哨问他，那人说：“我叫二黑眼，听说曼头来了，我想见他。”哨兵报告给曼头，曼头说这是熟人，立即请见。见面后，两人非常亲热，边谈话边抽大烟，于是便停止了上路。半夜时分，又来了一个找二黑眼的刘志全，也住到了鞋厂。

二黑眼这个人曾经在曼头的部队里呆过，与曼头关系不错，因此，曼头把他当成可靠的朋友。但此时这个家伙没有职业，又没有住处，到处流窜，现在聚集一些歹徒，以盗窃抢劫为生。

第二天黎明，曼头率队出发，行二三里

许，到了几座窑洞房前，此处为二黑眼落脚之处，里边住有十几个匪徒。曼头他们到时，这些匪徒正备好马准备出行。见曼头他们来，当即表示欢迎，并互赠礼品，以示友好。然后，二黑眼表示愿随曼头一块走，匪徒中也有十个人愿走。这时，匪徒们都因分离而哭泣起来。最后仍有四五个人留在原地。

曼头他们原来就有十一人，再加上二黑眼等十一人，这时他们已成了一支二十二人的队伍。当天他们走了五六十公里，住到西山咀以南的一个村庄里。次日，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在日出时他们才上路。

途中，二黑眼一伙与曼头中的七个人走在前头，曼头、巴代、宝日、劳莱班弟等四人因马走的慢落在后头。行至大坝庙的正南河对岸，离黄河沙边上哈仁戈太庙西北十里处的一个叫龙毛营的小村。村中仅有两处房屋，一处已破烂不堪。当曼头、巴代等四人走入村内时，刘志全迎上来说：“三少爷（指巴雅尔图）让我请你们到屋里暖一暖再走。”正当他们走到大门正南时，刘志全从紧贴在巴代马匹的左侧掏出手枪对在巴代

的脸上，并抓住缰绳逼巴代下了马。在刘志全掏手枪的同时，那些匪徒也一齐拔出手枪，对准曼头、宝日、劳莱班弟三人，逼他们下马。在无法抗拒的情况下，巴代、曼头、宝日三人只好都下马投降了，而劳莱班弟却拼命打马逃跑了。

原来捉劳莱班弟的人，只顾抢劳莱班弟胳膊上的步枪，并逼他下马，但没有抓住他的马嚼环。因此，劳莱班弟在放弃了步枪之后，就拼命地打马狂奔而逃，尽管身后枪弹如雨，但未伤着劳莱班弟。事后查看，劳莱班弟身穿的大衣打有窟窿几个，真可谓危险已极！

劳莱班弟脱险后，过了黄河走到玉兴店，此地有奇夫人的部队驻防。他怕被驻军刁难截留，就哄驻军说：“曼头、巴代等人明天从这里经过，派我前来请你们给准备二十多人的吃喝和马料。”当时驻军答应了。之后，劳莱班弟马不停蹄地奔回了包头和固阳，并分别向额尔和道尔吉和霍仁格团长报告了受骗上当和遇难的经过。

额尔和道尔吉在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悲愤万分！除痛恨巴代多事外，又怀疑是奇俊峰、沙格德尔、色林保捣的鬼。为了

弄清事情真相，并探明儿子们的结果起见，他特派心腹随从华喇嘛化装成乞丐到出事地点去探听。

及至华喇嘛赶到出事地点时，只见有五具尸体横陈野外，但都没有头。经他仔细从尸体各方面来判断，才分清了谁和谁。随后他又深入地进行调查，才得知事情的真相。原来是：

二黑眼当时正处在投降日本人或投降五原驻军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正在不能决定之际，恰好曼头他们来了，这不啻从天上掉下来一分见面礼。于是坚定了他投奔五原驻军的决心。那天他一共活捉了十个人，以后放走了两个人（汉族一人）。其余的八个人，除当场杀害五人外，剩下三人送交给五原驻军，也立即遭到杀害，并将人头悬挂城门示众。二黑眼因立了功，当即被五原驻军任命为团长。

## 十二

一九三七年末至一九三八年初，德穆楚克栋鲁普派一团蒙古兵驻在乌拉山以南的昇恆号（现在先锋公社一带）。任务是：一方面防备傅作义

军队的进攻，再方面就近监视奇夫人的行动。

蒙古军白团长曾去奇夫人府中拜访数次。由于奇夫人寡居无偶，白团长很想娶奇夫人为妻。此事虽未明言，但奇夫人已觉察到白的心意。奇夫人此时母以子贵，身居未来扎萨克母亲的显赫地位，岂肯移尊下嫁，有失体统。但考虑此时在白团长的控制之下，不得不虚与委蛇。不过她暗中与协理沙格德尔商定，她们母子伺机暂离前旗，以避其锋，旗印由协理沙格德尔护理。为了交接旗印，奇夫人和沙格德尔都在佛前点了佛灯以示郑重。据说奇夫人所点的佛灯过早熄灭，迷信者认为：这预示着不祥。

恰在此时，额尔和道尔吉的妹夫酒鬼桑杰，跑来向蒙古驻军白团长报告说：“傅作义部队与奇夫人之间有勾结，请早作准备。”白团长闻讯后，一方面命令部队准备迎战，另一方面派人请奇夫人来团议事。白团长的邀请更加速了奇夫人的逃亡。她当即向来人说：“俟安顿好家务事后就去。”在来人去后，她当晚率领十余人，保护着小阿哥，顺敦达高勒沟经吉日格勒图庙，一直奔向后山，然后朝西拐，连夜逃往五原去了。

太阳快要落山了，白团长还不见奇夫人的到来，他预感到可能上当受骗，当即连夜率领人马围攻奇夫人府，及至进内一看，府内人去楼空，奇夫人早已逃之夭夭了。对此，白团长悔恨莫及，但也无可奈何。由于他没有派人追赶，使奇夫人一行安然逃脱。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包头及其附近地区以后，暂未向后套一带进犯，集中力量巩固已被占领的地区并休整军队。到一九三八年以后，他们便向各旗派出了日本人作顾问。日本顾问是各旗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举凡全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等权力，都掌握在日本顾问手里。

额尔和道尔吉在日寇攻占包头后，即被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指派组织乌拉特前旗傀儡政府，以取代由色林保、沙格德尔协理护理的旧政府。傀儡政府先成立于包头园子巷，以后才回到旗里。一九三九年，乌兰察布盟派来一名日本退伍军人小仓茂（蒙人叫他乌库拉，可能是日语发音）来旗当顾问。

旗政府成立后，额尔和道尔吉即派桑杰去达



日盖庙取旗印。旗印原由奇夫人派出一排兵力把守，非常难取，但桑杰一到，护印军官立即把旗印交出来了。原因是护印军官与桑杰是阿勒坦钦苏木同乡。

### 十三

一九三八年奇夫人逃到套内地区后，很受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视和欢迎，并给予她各种优待和照顾。当时五原军政负责人是门炳岳（骑七师师长兼绥西警备司令），他命令绥西游击一支队司令武俊峯派人与奇夫人联系并护送五原。后来，门师长报请委任奇夫人为前旗游击司令。奇夫人到五原后，先住在永生号皮毛店，后又在梅林庙一带居住。奇夫人虽然流亡在外，但仍关心旗里事务。在五原时，她曾任命一些旗军政官员，如阿拉坦朝鲁、明珠尔、沙格德尔、扎木苏荣扎布、额尔和木巴雅尔等人，用以对抗傀儡政府。

一九四〇年，奇俊峯夫人亲去重庆，谒见了蒋介石，当面汇报了乌拉特前旗的情况，受到了蒋介石的嘉许，还答应拨给他军装和军饷，命令

她迅速打回家乡去。奇夫人从重庆回来后，立即着手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为打回老家去积极进行准备。奇夫人从重庆返回时，带来二百支步枪，五十支手枪和子弹。

在日本势力扶植下，以额尔和道尔吉为首的乌拉特前旗政府，也任命了满海、太保、色仁朋斯克、敖其尔巴图、松布尔巴图、桑杰等为政府的重要官员。由于扎萨克缺位，他们不能名正言顺地行使职权，于是决定从全旗台基贵族中物色扎萨克人选。选来选去，终于选定了家住在古拉本大坝的台基洛布僧桑杰的儿子阿木尔萨那充当扎萨克。就职那天，全旗大搞欢庆仪式，并请他住在已故大喇嘛达格丹的故居，还为他娶了一房夫人。日本军方也委任新扎萨克为全旗统兵团长。尽管表面上搞的热火朝天，实际阿木尔萨那有职无权，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额尔和道尔吉为人阴险狡猾，是制造前旗内乱的罪魁祸首。在他代理扎萨克期间，他把对自己好的，有恩情的人，都授以高职，委以重任，并秉承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命令，对奇夫人时期的重要官员都予以流放，以清理障碍。原协理色林

保、沙格德尔、梅林章京、斯日古楞、官其格巴自尔（系沙格德尔的长子）统统都被流放出去。流放地为锡林郭勒盟，流放期三年。在流放中，沙格德尔、官其格巴自尔父子两人很快地死去。色林保和斯日古楞好歹熬到释放回来，也忧病而死。除此之外，额尔和道尔吉送他四子金自强到伪满王爷庙（乌兰浩特）军官学校上学，后回旗当团长；还在旗里大搞征兵，为日伪“大东亚圣战”输送炮灰。

#### 十四

陶格套胡巴图（简称陶格套胡）汉名郝游龙，是色林保的唯一儿子，色林保死后，陶格套胡先在日本顾问山本处当特务。因为他做尽了坏事，无法存身，只好跑到伊盟达拉特旗他岳父家去。到达旗以后，他仍然在干坏事，闹的呆不住。再加上他曾指使别人炸过额尔和道尔吉，以泄其父流放致死之恨。尽管事未成功，但也惹起了人家的怀疑。由于以上各种原因，他决定逃亡后套，去投奔奇司令。

陶格套胡为人桀骜不驯，飞扬跋扈。在去后套

途中，到处收罗土匪、強盜，作为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治资本。及至抵达奇司令处时，他部下已有几十人了。他见到奇司令，首先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并表示决心愿在奇司令领导下，打回老家去，重建乌拉特前旗。

奇司令对陶格套胡的为人，也有些耳闻，见面后，首先给他的印象是此人不可靠。因此从心里感到不放心。由于这个原因，在陶格套胡来投后，当时并没有重用他。

奇司令的态度，并没有影响陶格套胡的情绪。他依然大开招兵买马之门，不久就招收了三个连的兵力。其中蒙汉都有，鱼龙混杂。他在掌握这部分兵力之后，迫使奇司令不得不委任他为团长，成为奇司令部下的一支“劲旅”。

## 十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奇司令带领部队随同傅作义的部队返回包头。这时，额尔和道尔吉早已逃到包头，当他听到奇司令回来的消息后，曾跑到距包头半日之遥的地方，热烈欢迎奇司令。傅作义来到前

山，吩咐奇司令回去要把额尔和道尔吉干掉，否则必有后患。额尔和道尔吉对此有所揣测，当下把奇司令请到包头西公旗办事处馈赠一千两鸦片，以行贿赂，使奇司令打消了要杀他的念头。奇司令以胜利者的姿态返旗后，对原在旗政府工作的所有人员，一律予以解职，不仅把后来充当扎萨克的阿木尔萨那驱赶回家为民，就连额尔和道尔吉协理也被赶回家中放牛去了。

旗务安排大体就绪后，奇司令去了归绥，办理其子就任旗扎萨克的批准任命手续。经绥远省政府批准后，奇司令立即返旗召集军政官员宣布了这项任命。并选择吉日为年仅八岁的小阿哥袭爵接位作一切准备。是日举行盛大仪式，除给这位新扎萨克捧上顶戴，授与旗印，使之登上扎萨克的宝座外，又举行盛大宴会，载歌载舞地欢庆了许多天。就奇司令本身来讲，也正以完成了一桩大事而自豪！心中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安慰。这样，平平静静地过了两年。

陶格套胡名为奇司令手下的团长，但是他野心很大，并不甘心受制于奇司令，他经常不断的招收杂牌军，网罗土匪，以扩大自己的实力。当

时在乌拉山南北，陶格套胡已成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往往走向它的反面，这道理在陶格套胡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在陶格套胡随同奇司令返回前旗不久，竟然在额尔和道尔吉的表态下，枪杀了奇司令母子。

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多，大致为：（1）陶格套胡因奇司令身边卫兵的武器装备比他的部队好，因而，惹起忌恨，遂生杀机；（2）郝游龙之母有恩于奇俊峯。在奇返旗后，郝母曾两次请求奇给其子加官晋级，均未达到目的，以致激怒了郝游龙；（3）阿木尔萨那的妻兄贺守忠（国民党中公旗书记长），不甘心于妹夫的下台，在奇死的前一个月，曾在包头召集郝游龙、金自强（额协理四子）、鄂枢中（前旗协理）等人开过两次秘密会议，决定刺杀奇俊峯；（4）额尔和道尔吉不甘心失败，经常为消灭奇司令出谋划策。等等。原因虽多，但究其实仍不外是一个“权”字。陶格套胡原非久居人下的池中物，从他一登场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作风来。如他不断地充实力量，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受奇司

令的制约，反而逼奇司令为他服务，等等。所有这些都给以后的权利斗争打下牢固的基础。及至羽毛丰满，展翅高飞之时，奇司令母子自然成了他的捕获物和牺牲品了。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四七年秋天，奇司令鉴于全国局势动荡不安，住在旗里不太安全，为保险起见，她决定全家迁往包头久居。此其一；她在后套曾结识情夫李隼清（国民党特务。任杭锦旗笔贴式——约等于文书或秘书），还生过一女。返旗后，不便来往，令人难耐，如居住包头就方便多了。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她约好情夫包头相会，就选择了吉日，在佛前烧香磕头后，领上阿哥，带上从人，乘坐轿车由公庙子府中出发，直奔包头而去。

太阳落山时，奇司令一行到了乌兰计村。这个村子是陶格套胡部队的驻防地。陶格套胡也住在这里，奇司令认为这个村子是很保险的住处，于是决定在乌兰计过夜，明日再去包头。

陶格套胡对奇司令的来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尽力招待，甚至连她

们的骑乘也送到牧场妥为放牧。奇司令因旅途困顿，精神疲倦，躺在烟榻上，时而吸食鸦片，以过烟瘾；时而朦胧睡去，以消疲劳。在不知不觉之中，天色黎明。当天，李隽清打发他的从人，携带信函和杏儿，乘汽车到呼和宝力格叫奇司令。奇司令到哈拉汉补隆旗衙门过晌，李的从人在呼和宝力格没有找见她，从呼和宝力格总部借骑一头毛驴，彻夜赶路，次日拂晓时在乌兰计追上了奇司令，将李隽清的信交给了奇司令。

当日出之际，从人们纷纷备马套车，准备登程。正在忙乱的时候，陶格套胡接过信和杏，故意将杏撒在地下，奇司令的卫兵急忙从地上拣拾杏。突然院内伏兵四起，乌黑的枪口直对奇司令及其护兵，逼她们投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奇司令一行只好举起双手，缴械投降了。

在奇司令母子投降之后，立即被陶格套胡带往达日盖庙，把奇司令和她的儿子一同安排住在巴图巴雅尔喇嘛的小院里，并加派岗哨，严禁任何人出入。

在去达日盖庙的途中，陶格套胡派人去叫额尔和道尔吉和太保来庙商量大事。原来陶格套胡



回旗以后，经常出入于额尔和道尔吉家中，与额尔和道尔吉三子巴雅尔图之女道络斤有染，早已准备作额尔和道尔吉家的孙女婿，因此忘却杀父之仇，彼此已亲如一家了。额尔和道尔吉早已知道陶格套胡来者不善，便使用美人计，心中闷闷自喜，表面上佯装若无其事。

太保名为旗府梅林章京，实则是额尔和道尔吉的忠实助手。他们两个人在来到达日盖庙后，看到陶格套胡的举动，来势不善，怀有野心，心中甚喜。太保当即劝额尔和道尔吉表态支持陶格套胡消灭奇司令母子的行动，并拥护陶格套胡执掌全旗军政大权，为坚定陶格套胡杀害奇司令母子的决心，太保曾自编自唱几句歌，当场唱给陶格套胡听。歌内充满了阿谀奉承之词，歌曰：

畜群出众的枣骝马哟，是全国有名的陶格套胡。

指挥着全军上战场哟，生来就有公爷的福分。

陶格套胡对如何处置奇司令及扎萨克阿拉腾敖其尔母子，早已心中有数，只是等待额尔和道尔吉的表态而已。及至额尔和道尔吉表明态度

后，陶格套胡马上命令心腹随从田小山，密藏在巴图巴雅尔喇嘛家的院墙根一带，伺机刺杀奇司令母子。不久，奇司令带上小阿哥由房內走出来，在刚要走出大门的时候，田小山立即开枪打死了奇司令。十岁的小阿哥情知不妙，马上跑回房內。田小山追进房中，在佛龕中拉出这位小扎萨克来一枪了事。这样，母子同归于尽。奇俊峰死时，年仅三十岁。最后，陶格套胡命人将尸体掩埋达日盖庙南面的石堆里，后又被人移葬在公庙子以南三印河头上。

在收拾了奇司令母子以后，陶格套胡立即出兵围攻了本很布浪（官牛棋）。那里驻有属于奇司令的少数兵马，他们在遭到突然袭击后，不战而降。陶格套胡又利用降兵作响导，直奔扎萨克府而来，由于天色昏暗，加之降兵又是自家人，守军不防，致被陶格套胡的军队拥进府中，缴了几十个士兵的械。然后，正式向众宣布：“奇司令母子已被处决！全军司令官由陶格套胡担任。”

关于杀害奇司令母子事件，是陶格套胡的单独行动。他是在贺守忠他们尚未派出刺客以前下

的手，走在了贺守忠他们的前边。陶格套胡逮捕了奇司令后，考虑是把她杀掉好呢，还是不杀好呢？陶格套胡琢磨许久：如果要放了她，就等于放虎归山，必有后患，而且后患无穷。她必定会疯狂地报复。最后选择了还是杀掉为佳，于是就杀了她。此后，奇司令的母亲向伪绥远省政府呈递诉讼、告了状。伪绥远省政府裁定，由前旗拿出二十两黄金，两千银元作为对奇司令母亲的抚恤。

## 十六

一九四七年，年仅二十八、九岁的陶格套胡在夺取全旗军政大权以后，志得意满，专横恣纵，目中无人，不可一世。首先，在私生活方面娶了额尔和道尔吉的孙女为妾——不是巴雅尔图之女道络斤，而是曼头之女满达力格力。婚后，与满达力格力经常住在原奇司令府的总部里，置老母、结发妻于不顾。其次，他横征暴敛，按户抽税，以饱私囊。第三，购买汽车一辆，供他个人乘用。在公务方面，他按照额尔和道尔吉的主张办事。

这时，额尔和道尔吉由于和陶格套胡结了亲戚，依然官居原职，声势显赫。为了收钱财，和聚财富起见，他别出心才地仿效卖官鬻爵的办法，在牧民中间大赏职衔和顶戴，以捞取油水。大致上：凡赏给侍卫、门子职衔者，至少须献银子一盘；如赏给地位较高的总管、梅林章京、甲喇职衔者，则必须献出大牲畜若干才行。

## 十七

贺希格太平（又名贺太保）连长，原为奇司令部下，现归陶格套胡指挥，驻防在海流图、乌兰额尔根等地。在他的驻地内经常有傅作义的散兵游勇经过，他乘机收缴了许多武器。此事被傅作义军方知道后，立即命令陶格套胡如数归还枪支，对此，陶格套胡不敢不遵。

一九四八年秋天，陶格套胡带兵到了苗园圪旦，以全军集合点名为由，通知贺希格太平集中兵力来苗园圪旦点名，及至贺希格太平带兵来到后，正在与陶格套胡寒暄问好之际，分布在两旁的陶格套胡卫兵早已动手摘下贺希格太平及其随从的枪支。陶格套胡当场宣布撤销贺希格太平连

长职务，并勒令回家为民；对其亲信人员，也作了同样处理。至于贺希格太平的原有部队则派其心腹那木吉勒指挥，并调防驻在哈叶胡同。

贺希格太平虽被削职为民，失去军权，但他并不甘心于失败，他经常派人到哈叶胡同与原部队联系，并窥伺陶格套胡的动向。当他发现他的心腹旧部下道老金、道尔吉斯楞、陶格屯格日勒等与新任连长那木吉勒同住一室，而新连长并没有什么戒备之时，于是放心大胆地和他们策划消灭陶格套胡的对策，并等待时机的到来。

一九四九年七月间，有一天陶格套胡乘坐汽车由公庙子总部回乌兰计家的途中，顺路下车到哈叶胡同那木吉勒处巡视。陶格套胡本是个大烟鬼，烟瘾很重，在途中早就烟瘾发作，渴望早些吞云吐雾。及至进屋后，连话也没来得及多说，就吸起料面来了。在他还没过足烟瘾的功夫，突然从窗户和门口伸进了乌亮的枪口来，向屋里乱放一通。此时，陶格套胡看到身边的侍卫人员和连长那木吉勒都已中弹跌倒，自己想到反抗无益，反招速亡。急中生智，他马上闭住气躺在尸体中，装死哄人。

过了一会，外边人听到屋里没有动静，就扒在窗口向屋里马马虎虎地看了一下，只见炕上地下，横七竖八躺的都是尸体，血流遍地，不见一个活人，就认为屋里的人都被打死了，也就没有进屋详细查看。

打死陶格套胡是一件大喜事。因此，贺希格太平的一些旧部下，都打马加鞭急于去后山向贺希格太平报喜，并请功受赏，当他们走到梅力更庙附近的时候，看见一辆汽车从哈叶胡同出来，向东飞驰而去，他们并未在意。谁知这开汽车的正是陶格套胡。原来他在人声寂静后，从尸体中爬了出来，自己开车，加足马力高速度地奔驰回家。

贺希格太平在听到这个胜利的消息后，举行大宴，热烈庆祝，着实地热闹了一番。事后听到陶格套胡并没有死，正在整顿兵马进行报复，顿时感到手足无措，无奈，只好远走高飞，于是奔往乌兰察布盟去逃难，后来在乌兰察布盟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

## 十八

一九四八年年初，陶格套胡竟丧心病狂地与傅作义部下刘万春军长挂上了勾，愿为其反共、剿共的政策效劳卖命。陶格套胡的举动，博得刘万春的赞许，立即委任他为“华北地区剿匪司令”，并命令他组织力量向解放军进攻。

是年末，陶格套胡率部东进。在行至包头东登口一带时，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遭遇上了。战斗开始后不久，解放军骑兵挥刀冲杀过来，来势勇猛，锐不可当。陶格套胡所部本为土匪集团，又系乌合之众，那里见过这样的大阵势，只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从此，他不敢言战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避开绥远省府的耳目，召开旗军政官员会议，会议由额尔和道尔吉、陶格套胡主持。会议宗旨是根据形势商定前旗今后的去向。会议争论激烈，意见迥然各异。但大部官员认为共产党已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垮台已在旦夕，故主张应及早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以安后退之路。在参加会议人员占绝对压倒优势的情况

下，陶格套胡才勉强同意与共产党联系。正当这时，共产党代表毕力格巴特尔、特布信、沙木腾来函叫太保、松布尔巴图、恩克巴雅尔等人前往四子王旗和共产党联系。太保未去，松布尔巴图、恩克巴雅尔遂化装成商人，避开敌人的监视去四子王旗，参加了一个多月的政治学习，返回旗里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可是，陶格套胡、额尔和道尔吉贼心不死，仍暗地派梅林阿拉腾朝鲁去阿拉善旗与正在那里筹建西蒙自治政府的德王联系，图谋东山再起。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省和平起义。乌拉特前旗在协理额尔和道尔吉的主持下，也参加了起义，并派松布尔巴图、恩克巴雅尔等去乌兰察布盟联系，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久，党就派来以赵戈锐（土默特旗人）为首的工作组赴旗工作，正式成立了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开展了革命工作。

陶格套胡在参加革命工作后，仍然指挥着全旗武装。但由于他反动立场未变，处处抱有敌对情绪。如解放军骑兵蒙四师以崑独崙庙为基地，在乌盟境内消灭土匪，要求他予以配合，他却消



极应付，不肯出力。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虽然工作人员给他再三地讲政策，耐心地进行思想教育，但他却拒绝交待自己的问题，反之，他私藏枪支弹药，设立电台与国民党匪部联系，企图东山再起推翻革命政权。在一次党组织的民族上层人士进京参观团进京参观时，陶格套胡也参加了。当时规定任何人随身不准携带枪支武器，因除参观外，还要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行至张家口时，有人看到陶格套胡睡觉不脱衣服，后来在他洗澡当中，发现他随身带有枪支。对于他一直坚持反动立场，与党和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行为，经我们查正落实了他的罪恶事实后，当即予以逮捕。

一九五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旭日东升，万里无云。旗人民政府召集全旗牧民、农民、干部、战士、学生开大会，庆祝佳节。会场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当会场主持人宣布开会后，立即由解放军带上五六个人，站在会场当中。原来这些人是斯仁朋斯克、沙格德尔等人，他们在思想改造中，认罪态度好，当场被释放回家。

随即由人民解放军把陶格套胡押上来。这时，解放军蒙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登台讲话，宣布了陶格套胡的大量罪恶事实。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罪大恶极的陶格套胡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当即由人民解放军战士将陶格套胡架至旗人民政府东侧水沟内执行了枪决。

从此，结束了二十多年来乌拉特前旗的混乱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旗各族人民走向了团结、友爱、光明、繁荣和幸福的道路。

# 日寇侵占大余太时的简况

董 玉 奇

## (一) 简介重镇大余太

清光绪二十九年，在大余太设治五原厅（后移治于兴盛旺、又移治于隆兴长即五原），管辖萨拉齐之西部后套地区。

在五原厅设治时，大余太设置“分司巡检”，进入民国以后五原厅改为五原县，“分司巡检”同时裁撤。民国十四年五月一日，设置了大余太设治局，由垦务分局局长张锡余兼任局长。以后实行委放制，由王佑、孙起凤、田思诏、李成励、魏治馨、杨承愉等继任局长。民国十八年八月，大余太设治局改为安北设治局，局长为邱文彬。以后由郑桓武、齐寿康、陈国祯等继任局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大余太筹备并成立了日伪“安北县公署”（归巴彦塔拉盟管辖），与乌梁素海以西八战区境内的安北设治局、安北县隔海对峙。安北县公署县长佈和巴雅

尔；安北设治局长、县长分别为张龙祥、乔学会、张玉璞、薛佩印、陈质文等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余太地区重归安北县政府管辖，设置了区公所。

在安北设治局时期，管辖地区极为辽阔。西起蔡家地（五原附近），东至后口子（包头附近），北连中公旗的交错地带，南临大黄河，东西长达三百余华里，南北宽将近一百华里，在大余太设立第一区公所，在贾泉湾设立第二区公所，在桥湾设立第三区公所，每个区各设十个乡。在敌伪统治时期，其辖境大为缩小，名义上是：西濒乌梁素海，东接包头、固阳，北邻中公旗，南界西公旗，东西长约二百华里，南北宽约六十华里，而实际上，敌人仅可控制乌梁素海东岸一带，以及大安镇（今大余太）、余仁乡（今明安）、余智乡（今朝阳）、余忠乡（今小余太）等乡镇和交通要道。抗战胜利以后，大余太地区归安北县管辖时，除乌拉山前后归西公旗隶属外，其余辖域与安北设治局时期相同。一九五四年，大余太划归乌拉特前旗管辖。一九五八年，撤销安北县的建制并入乌拉特前旗以后，在大余太、

明安、成立了人民公社。

大余太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盛，矿产也很丰富，目前大余太乡是乌拉特前旗农业亩产最高，总产最多，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乡。但在旧社会，大余太地区在农业上，沿用落后的耕作工具和粗放的经营方法，种植小麦、糜子、莜麦、荞麦，亩产一二百斤，遇有蝗、旱等自然灾害，收成更低；牧业上，以放牧牛、马、羊、驼等牲畜为主，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榨，加之，缺乏用科学方法饲养繁殖，以致发展缓慢，每年除农牧民少量食用外，可向外地出售一些皮毛，换取些生产生活资料；工业上，仅有些小手工业，无任何现代化的工业。尽管当地蕴藏着煤、云母、石棉、沙金、白矾等轻重工业原料，但在日伪时期，仅有数十人挖掘石棉。此外，再无开办任何矿山工厂。

清末以后，归绥（今呼市）、包头两地商贾云集，大宗皮毛、药材运往京、津销售或出口，这些物资产于新、甘、青、宁等地，绝大部分是由骆驼驮载而来，因而开辟了绥新驼路。大余太是归、包通向宁、甘、青、新等地的主要经过地

点，由包头经后口子，到大余太，然后再经乌兰脑包、义太魁、磴口、到宁夏平罗为北路；由大余太经四柜、隆兴长（五原）、公中庙、磴口，抵宁夏平罗为中路；由大余太经大有公、西槐木、邬家地、强油房（今临河）、头道桥、老磴口、石咀山到宁夏平罗为南路。安北设治局时期，大余太可向包头通电话、汽车，但运输物资仍以骆驼为主。日伪统治时期，大余太可向南昌、台梁、后口子、包头通电话，向包头通汽车。虽然由大余太向阿拉奔（现为额尔登布拉格）、小余太等地修过公路，但无专人维修管理，也没有使用过多少次。

大余太成为绥新驼队来往住宿休息的地点以后，逐渐形成城市货物与农牧区产品交易的场所。民国十八年，安北设治局局长郑桓武在任时，为了平靖地面，防治匪患，发展商业，活跃经济，于是大兴工程，修筑土城。其办法是：强迫民众，外侧挖土成壕，内侧堆土筑墙，简便易行，一举两得，故其进展甚快，于民国十九年竣工。城壕深一丈，宽三丈，城墙高二丈，顶宽六尺，周长共六里，直径一里半见方，东西开门，

南北设水闸。从此，人称“余太城”。

余太城在抗战前夕，已逐渐发展成为余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聚集的中心。城里除设有政权机构和学校之外，还开设了几家规模不大的京货店、皮毛店、杂货店、车马店、肉铺、饭铺、剃头铺、药铺、磨坊、碾坊、缸坊、豆腐坊以及木匠、铁匠等手工业。农牧民经常进城购买生产生活等用品，也还方便。到了日伪统治时期，余太城骤然起了变化：插上“红膏药旗”，驻上日军司令部和日伪军队，成立了伪县公署、警察大队、宪兵队、维持会、日本小学。此外，还开设了大蒙公司、照相馆、富士食堂、代歌楼、随军妓院……。至于余太城里的人口，抗战期间有七百多口，连同其它各乡的人口达七千多口，而今单大余太乡的人口就达二万三千多人，连同明安、小余太、朝阳等乡在内共达五万八千多人。

大余太，不仅是通往包头、固阳、中后、五原等地的交通枢纽，而且是包头与后套之间的要隘。它是守护后套的重要门户，收复归包的必经大道，向东进军的军事重地。日寇若占领了这

里，则成为凭借乌梁素海与八战区军队对峙的前沿基地，构成了护卫包头的外围据点，进犯后套的跳板。无怪乎日寇占领包头之后，虎视眈眈，迭出重兵，侵占大余太七年有余。

## （二）日伪夺城战人民遭涂炭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沿平绥路向西侵犯，张家口、大同、丰镇、归绥、包头相继失陷。敌人对占领区，烧杀掠夺，奸淫妇女，穷凶极恶，无所不为。包头附近及绥西一带的城乡人民，耳闻目睹日寇的残酷暴行，个个咬牙切齿，愤恨万分；终日人心惶惶，忧虑重重，为自己的家乡一旦失陷而提心吊胆，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到处流浪，谁也不忍心弃老舍幼，妻离子散，谁也更不甘心当牛作马、偷生苟安。可是，就在固阳县落入敌手以后，战火灾难迅速蔓延到余太城。

在固阳县失守时，杨德三拢络了旧社会保安队兰瑞、薛义、周志聪等所带的团伙，同时收罗了一些散兵游荡者，共约四五百人，背叛祖国投靠日寇，被改编为保安团（老乡称“杨团”）。



日寇占领包头不久，需要布防修整，无力立即向西侵犯，于是派杨德三率保安团人马，占领并驻防余太城，给他们效劳卖命。杨德三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地让其主子驱使。

一九三七年阴历九月十五日，“杨团”带领其全部人马，由后口子经明安等地，突然占领了余太城，他们穿上日军服，骑上中国马，打上“膏药旗”，学说日本话。余太城里的人民给他们吃上、喝上、安置房子住上，而他们却凭陵敌势，为虎作伥。他们闯进商店，私人民房，翻箱倒柜，明目张胆，刁抢民财，欺女打男，真是一帮无所不为，十恶不赦的狂徒。后来日寇从包头把张耀的人马，派归杨德三指挥。东公旗的贺得功、吕子新、当地的武俊峰等人马，也投归杨德三率领。从此，日寇加封杨德三为保安司令之职，升为少将官衔。这些伪军汇合到一起以后，人杂马乱，放荡成性，有的抢劫商人的银元、财物、大烟个人享用；有的挖开农民的粮窖，把糜子、麦子饲养了马匹。闹得家家不宁、户户不安，但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言。

一九三七年腊月二十九日，在门炳岳的主谋

下，由门的骑七师，石玉山的骑四师和乔占海（代理）的游击师，各抽调部分人马，周密部署，互相配合，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收复了余太，消灭了伪军。其具体分工任务是：骑七师的十九团攻打西门、西南城角；游击师乔占海率一个团，骑四师田占海率一个连，共同攻打城南一带；游击师的王国祥率第二连并指挥第三连攻打东门一带；游击师的张汉山率第一连、罗永胜率第四连攻打北门角。此外，还在日寇可能从固阳、包头增援的险要地区，严加戒备，以防意外。

是夜，“杨团”的人马，正在剥葱、捣蒜、剁肉、和面准备包饺子过年，万万没有预料到绥西的军队攻城。他们在四面八方围攻冲锋的密集枪弹中，晕头转向，一片骚乱，尽管仓仓惶惶地进行了还击，但由于他们乃是乌合之众，再加实力不足且无接应，所以余太城很快被攻破，全军复没。杨德三的人马企图由东门突围，遭到负责攻城部队狠狠打击，结果杨德三化装只身逃脱，其手下随从四五人被击毙，另有三十多名士兵也被打死。人们对这帮叛国害民的匪徒恨之入

骨，所以把这些冻硬了的尸体运到东门外垒了一堆。至于杨德三逃到固阳以后，又收拾残兵败将，招兵买马，企图重张旗鼓，卷土重来。岂知其手下心腹人弓得胜，举义投靠绥西的部队，于是亲手杀掉了这个罪魁祸首。余太城这场战斗结束以后，门炳岳师长，欲委派乔占海担任旅长，统率所有攻城部队和反正过来的部队，仍然驻防大余太。乔占海一再推辞没有接任，后来在所有军官中，共同推荐武俊峰担任了旅长，由骑七师委派了一位乔副旅长，由骑四师委派了一位何参谋，以便共同带好这个新组成的部队。从此，余太城的乡亲们满以为可以安居乐业，不再受鬼子的蹂躏了。谁想不久以后，日寇为了报复消灭“杨团”之仇，为了追击马占山部队，从而长期统治余太地区，于是又出重兵攻陷了余太城。使城内的军民遭到难以形容的惨酷屠杀。

日寇为什么要追击马占山部呢？原来在平津沦陷以后，他们沿平绥线大举西犯时，马占山部尽管装备实力极其低劣，但在张家口一带曾有力地抵抗和阻击过日寇，因而激怒了他们，紧紧尾追马部不放，企图全歼该部而后已。随着战局的

发展，于是形成日寇边打边追，马部边退边打的趋势。当固阳失守以后，马部向余太方向撤来，日寇出动飞机、大炮、装备精良的部队，也向余太方向追来。

马占山部来到余太城附近时，与城防司令武俊峰联络，要求入城修整迎战日寇，但遭到武俊峰的拒绝。马部想派士兵进城买些烟火之类的用品，也未蒙许可。后经一再交涉，才用长绳拴上筐子，把钱吊上城墙，然后买上东西再吊下城去。马部在如此情况下，离开余太西去。武俊峰为何如此绝情呢？其中也有缘由。原来，余太城来了三位带有关防印信文件的上司大员，当马占山要求入城时，这三人以上司派员的身份，坚决不许武俊峰放入，武俊峰只好遵命照办。谁想后来日寇占了余太城以后，这三位大员，竟坐上了日寇的汽车，说明他们乃是特务人员，而武俊峰却懵懵懂懂受了欺骗。

一九三八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的早晨，日寇出动了汽车、装甲车由固阳县沿小余太川向西推进，余太城内军民，毫无半点觉察。接着，余太城上空出现日机三架，低飞侦察了一番之后向

东飞去。大家也不以为然。过了不久，日机三架又在余太城上空盘旋，这时城北煤窰沟口，出现了头戴钢盔身穿草黄色军装的日军，并把大炮架在沟口东侧，居高临下，威胁着余太城及其附近地区。就在日机向城内街道上、我军阵地上低飞投弹扫射时，大炮也向飞机轰炸过的目标，接连轰击而来。与此同时，敌人隐蔽在煤窰沟内的汽车、装甲车摆成“钳”形阵，包围了余太城。一路由西向南，一路由东绕南而西，迂迴汇合。在日寇的战车奔驰、机枪乱鸣下，烟硝弥漫，黄尘滚滚，其攻势十分凶猛。

当时在城内外驻防的部队实力，计有武俊峰的第一、五团二百多人，安华庭旅的第十团约六百人，门炳岳师的一个参谋带两个连约三百多人，共计一千人。虽然在仓慌中，分别奋起迎战，但在对方陆空配合及用当时比较精锐的武器攻击下，我方实际上难以取胜。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向石纳干、阿拉奔等方向突围。

在这次突围中，曾抽出兵力阻击日寇，有两处打得英勇顽强。其一是骑七师的十七名士兵，在十七份子村的一个圈套里隐蔽，日寇的汽车横

冲直撞，以为所向无敌，不料在这里受到阻击，牵制住二十多辆汽车不能前进，到天快黑时，派来援兵，骑七师的士兵才撤去。他们只好拖走被打坏的汽车以及被击毙的二三十具尸体。另一处是岳升团下属三连连长敖腾（蒙人），奉令在西门上掩护，他英勇沉着指挥战斗，后来干脆由他一个人，时而在城内射击，时而又从水闸钻出城外射击，直到子弹打完连其护兵的子弹也打完，才从水闸里钻出城墙，向山上逃去，鬼子追赶不上，只好罢休。日寇清扫战场时，在西门附近用三辆汽车装了数十具尸体拉去，然后连同骑七师击毙的二三十具尸体一併火焚。

突围，一般地处于艰险、危难的形势之下。大余太这次突围也不例外，武俊峰在紧急关头，从南城墙上只身逃出，后来遇上张汉山，送给他一头骡子才骑上。余太城里的老百姓，一片混乱。有的人藏在家里，听天由命；有的人扶老携幼挤出西门，或者跳出城墙，向西及西南方向逃避。我方军民在城西和西南一带开阔地区，遭到日寇战车的疯狂追击，牺牲得十分惨重。有的头烂胸穿，肚破肠断；有的中弹多处，浑身血染。

血腥味、烟硝味混在一起，使人窒息悲愤。

余太城里的邬三来红（今年八十二岁），当时他也逃出城外，日寇用汽车追击我军民时，他藏在一堆沙蓬下窥视，见鬼子在城南回回坟附近，追上十几个老百姓，除留下一个穿红袄的闺女外，其余全用机枪射死，横七竖八的倒在血泊里；库贵宝、库太宝、吴富小等三人，跑到三贵人的房后藏起，但也沒逃脫追击，流尽了鲜血死在他人的房后；有些买卖人拉的一百多峰骆驼，逃到毛窰子一带，也在一阵扫射之后，躺了下来，留下了它们的遗体；田地生的父亲，跑到城外遇上敌人追击，他在急忙中藏在一个塌毀的圈圖里，敌人追到这里，并未仔细搜索，在四堵墙外撒了一滩臊尿便上车而去，而田老汉在惊恐气愤下，不久便与世长辞。

在城内大街小巷，也到处有倒臥在血泊里的尸体，惨不忍睹。有个在王满元房里做买卖的掌柜，藏在窖里，他死活都不出来，而鬼子又不敢下窖去，便开枪把他打死在窖内。一个军人换成便服，唯军帽还没換过，他碰见一位毡匠，戴着便帽，便乘其不注意互換了帽子，恰在这时鬼子

赶来，发现毡匠带着军帽，认为是反抗他们的军人，于是拔出战刀，恶狠狠地向这位毡匠砍了一刀。另外，当飞机向城内大街十字路口投弹时，殷老汉正在做小买卖，被炸弹夺走了性命。剃头铺的高师傅，听到飞机低飞时，急忙出铺逃躲，结果被炸弹炸得骨肉横飞，一只手臂飞上房檐，墙壁上沾满了鲜血和脑浆。

### （三）“三·二五”日寇大屠杀

一九三八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阳光暗淡，山川变色，日寇攻陷余太城以后，在城墙上、城门上戒备森严，杀气腾腾，气氛可畏。整个城池变成一所监狱，中国人民成了他们任意宰割的羔羊。日寇宣传的所谓“中日友善”“睦邻相处”乃是一派鬼话。他们张牙舞爪，耀武扬威，用刺刀机枪，把城里的男女老少赶到后街一带，分片集中起来，准备澄清每个人的身份以后，下毒手大惨杀。其目的无非是，彻底消灭中国人的反抗力量，长期奴役统治这块地区而已。

当时城内居民陈虎，以开碾磨坊为业，本人好管事有威信，众人推他当维持会长。宋德富河北人，贫苦家庭出身，日寇进城以后，逼着他跑



前走后，也被选为副会长。日寇强迫维持会长和镇长徐士威，对集中起来的人逐一细认，并把认识与不认识者分开看管。在被包围的当地人、探亲的人、拉骆驼的商人、化装了的军人以及担架队（骑七师准备攻打固阳，从五原、临河征集的担架队，三月二十四住到余太城三百多人）等人，虽然愤怒万分，但无可奈何，有的心惊胆颤，面面相觑，谁也预料不到自己如何结局。

在认人的当中，人们不清楚敌人的企图何在，有的急于想叫陈虎认出他来，以便逃脱虎口；有的则怕被陈虎认出来之后不利。而陈虎在敌人刺刀逼迫之下，不得不如实认人，不过他对城内的人、面孔熟悉但叫不出名字的城外人、他不认识而对方喊他“陈虎哥”、“陈虎叔”的人，都认为是认识的余太人。郭三来红的两个内弟来余太探亲，陈虎不认识，被列在不认识的人群内，三来红向陈虎说明情况，陈虎向日本翻译说明原委，于是把这二人又列入余太人的范围以内。

在陈虎等不认识的一批人中，还有不愿叫认识者、受敌人欺骗者、兄代弟死者等等情况。如

王满库之子王治岐躲在众人身后，逃过陈虎目光，致被陈虎漏认，列为不相识者范围之内；又如敌人狡猾地高喊：“给军队上做过饭的，喂过马的，统统的出来干活！”有些朴实的马伕、伙伕果然站出一部分，被列入不相识者范围之内；还有杨四是个军人，其兄杨大，不忍心其弟受害，强行换上杨四的军衣，结果也列为不相识者范围之内。凡陈虎等所有不相识的人，完全拉到另一个圈圈里，严加监视，都成了屠宰的对象。

邬三来红，当时以小商贩为生，日寇进城以后，对他搜身，只搜出一把钥匙，再没发现其它可疑之处，鬼子诡计多端，叫邬三来红用这把钥匙开门，以试虚实。结果三来红用钥匙开了自己的房门，鬼子消除了怀疑，便逼上他去挑水。当时余太的井有十几丈深，要用轱辘绞水。邬三来红有吸大烟的嗜好，一桶水绞的他精疲力竭，而鬼子嫌太慢，打了三来红几巴掌。当三来红勉强打满一担水后，鬼子逼他挑到西门外城壕旁为了洗手洗刀之用。三来红惊呆了，原来这里开了屠宰场。

日寇把那些所谓不认识的“危险分子”“嫌疑犯”五花大绑，一批一批拉到西门外城壕旁，对每个人任砍或任捅一刀。有的头掉血湧，有的颈裂头连，有的腹开肠流，有的臂掉腿残。在一刀之下，没死的和半死的人都推到城壕里，让后来被杀死的人，压死或闷死。鬼子们的双手和屠刀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军衣上到处是血迹斑斑。就在三来红看的惨痛之际，被一个鬼子踹了他一脚，用不中不日的話，比比划划，意思是说：“不杀你的头就够好了，你还不快快开路！”三来红会意，赶快离开这里。

“三·二五”这天，三来红在西门外，亲眼看到鬼子惨杀了约三百人。王国祥在突围中，也亲眼看到牺牲者约一百人，总共达四五百人。死尸成山，血流成河！成群成群的狗，大啃大嚼死人肉，直吃得眼睛发红，凶残可怕，后来见了活人也敢乱扑乱咬。阴历三四月的天气渐热，西门外一带的死尸，很快糜烂。那种臭不可闻、惨不忍睹的情景，如今七十八岁的老人深深烙在心头上，犹如就在昨天一般。

日寇进行了这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之后，修

整了十几天，自动龟缩回包头。武俊峰又收罗起其部下返回余太城。

#### （四）在七年多的统治之下

##### （1）假仁假义怀柔手段

一九三九年阴历二月二十六日，日寇由包头出动了六十多辆汽车、装甲车，在小林一男大佐指挥和飞机掩护下，经由后口子、明安等地，肆无忌惮向余太城进犯。这次守城军队没有抵抗，于是“膏药旗”又插在这块土地的上空。他们为了达到长期统治下去的目的，首先施张了假仁假义伎俩，玩弄怀柔手段。日寇组织宣传宣抚队，坐上汽车、带上饼干、糖块、香烟，在城内和各乡村活动。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日友善”、“皇军保护良民”等花言巧语迷惑欺骗群众。一开始散发食品时人们不敢吃，后来有人尝了尝没受到危害时，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恩赐”。

日寇头目小林一男，平时穿军便服，不戴军衔阶级，经常走出司令部到各处转转。他见到当地居民，问长问短，表露出一付“温和仁慈”的伪善面貌；有时对余太城的小孩抱抱，表示“中

“日亲善”的象征；他们发动群众打苍蝇，每打一盒可以换一盒香烟，其目的是叫人感到“皇军多么关心百姓的健康”。

## （2）戒备练兵意在占领

小林一男为了长期统治大余太，为了他率领的联队（团）安全，于是用刺刀、皮鞭征集民工、修筑城防工事和军营。他们在城门上、城墙上，修起碉堡、掩体；在城四周深挖护城壕，架上铁丝网；在城内后街以北，划为军营司令部、操场，华人不得逾越一步；在军营的西北方向，建起两栋大兵房（每栋可容一二百人），还盖起司令部、办公室、军官宿舍、两个伙房（一在西北，一在东南）。另外给派往台梁、南昌、后口子及石纳干的伪军、警察盖起了三角碉堡。还于一九四二年仿照余太城的办法，给南昌修筑了一座周长四里的方土城。被征用的民工在毒打下劳动，无合理的报酬，有时他们为了买好民心，劳动终日发几盒火柴，有时也发些低微的工资，但被工头从中揩了油，民工们苦不敢言。

日寇在余太城的城门口、城墙上，在南昌、台梁、后口子、石纳干等外围据点上，设立岗

哨，严加警戒、盘查行人，进行镇压。中国人进出城门，通过岗哨，必须向鬼子鞠躬，否则按反抗“皇军”论处。他们对俊俏妇女进行调戏，对其认为有怀疑，不顺眼的人，立即扣押起来，审讯追究。另外经常派兵在乌梁素海东岸一带侦察，监视八战区的军事动态，严防遭到奇袭。有时在“讨伐”中与八战区军队接了火，便马上关闭城门防守，以防发生意外。

小林一男是个地地道道的天皇走卒，武士道的信徒。他每天黎明集合全体官兵，向“东方遥拜”（向他们的天照大神及天皇遥拜），而且念念有词。大意是“祝天皇万寿无疆”、“武运长久”。另外他对训练士兵，严格认真，经常让士兵戴上护面、护胸，练习拼刺，还经常搞打靶和实弹（橡皮弹头）射击。他们随时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作准备。

### （3）精心设置傀儡政权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寇着手筹建傀儡政权。派山田恒为“安北县公署”筹备处顾问，派东北蒙人佈和巴雅尔（汉名马成明）担任筹备处处长。下设总务、警务二科，进行具体筹备事宜。

在各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全部结束之后，“安北县公署”正式成立。地址设在现余大粮库院内，由山田恆正式担任顾问，由佈和巴雅尔担任县长。其下设主要机构和职权是：

民政科：设会计、财务、实业三股。会计股掌管各项用度和经费开支等事宜；财务股掌管财政收入、税务等事宜；实业股掌管丈量土地、征收粮款、大烟等事宜。另外还设专人，管理学校教育等事宜。

总务科：掌管行政、人事、粮饷、生活等事宜。

警察大队：设警务、警备二股。警务股，掌管人事、装备、被服等事宜；警备股，掌管军械、弹药、情报、发良民证等事宜（本股下设看守所、监押人犯）。在大队部之下，管辖警察署及第一、二、三中队。警察署，负责训练警察、维持城内治安，各中队负责对派驻地区的警戒和维持治安等任务。第一中队派驻后口子，第二中队派驻台梁，第三中队派驻南昌。

总括县公署五十多人，警察署四十多人，警察大队三百多人，都受日本人统辖。县公署顾问

(后改为参事)山田恆、林寛忠、高桥良泽、钱川正；警察大队首席指导官冈部正好；警察署指导官莺初真美；警务股指导官五丁未光；警备股指导官小池猛；民政总务二科辅佐官松本义春；第三中队指导官高桥信雄等均归日本司令官小林一男和以后接任的石桥指挥。而县长、科长、股长、署长、大、中队长等，均归同级的日本指导官定夺一切。

顾问山田恆，系简任级官衔，由上级派来安北第一线“开辟政权”，他说一不二。当地需要多少经费，上级如数照拨。林寛忠、高桥良泽、钱川正等人虽不如山田恆官衔高，但同样说话算数，都能随意进出日本司令部，乃是“安北县公署”真正的一把手。县长佈和巴雅尔系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一百多元（每元可换银元九角五分）蒙疆票。他处处得依照顾问、参事的意见办事，形同虚设。至于警察大队长高谷暘，相当于上校，但他处处得听从相当于中校的日本首席指导官冈部正好指挥。

警察大队的人马，一部分由萨县、东北一带调拨而来，另一部分由当地乡村保甲抽派而来。除



少数好人外，大部分是烟鬼、赌棍、流氓、土匪。他们用的是汉阳造步枪和六五、七九步枪。这帮人靠向老百姓征粮要款过活，反而任意欺压老百姓，比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县公署的基层，设立乡、镇、保、甲。余太附近为大安镇，设镇长一人、文书一人、跑腿者二三人。其余余仁、余智、余忠等乡，也各设一名乡长、一名文书及跑乡者二三人。他们执行县公署的命令，摊派征收粮款，收购大烟，发放良民证、支应杂差等事宜。

#### (4) 奴化教育毒害心灵

日寇在余太城里，开办了一所小学校。其地扯设在县公署院内，有四五个教师，四五十名学生。以后校址移到前街路东，有五六名教师，五六十名学生。这个学校完全按日本帝国主义教育方针教学。学生每日以学日语、算术、汉语为主，也开设唱歌、图画、体操等课。他们着重灌输天皇至上思想，武士道精神以及法西斯式的服从观念。每天朝会时，要向东方“遥拜”，平时和上体操课时，完全要按军事化的要求动作，根本不让儿童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许有丝毫民族

主义感，更不许对日有不满情绪。

### (5) 毒化政策摧残健康

日寇占领余太以后，实行毒化政策，强制农民大量种植大烟，除上缴公家外，可以自己抽用。每年春耕季节下种烟籽，烟苗出土以后，经过锄草抚育、施肥浇灌，到六月份收割奶浆，然后把奶浆晒成烟膏，再晒成板子。由于地质好坏不同，经营管理技术有高有低，所以收获烟土也多寡不一。一般每亩地可收烟膏七八十两，约可晒成干板子三十多两，每亩地交公家十两。

为了办好收交烟土任务，巴彦塔拉盟成立了“清查权运局”办理此事。每年由县公署，把各乡村种植大烟亩数、土质好坏加以登记造册，报到“清查权运局”备案。收大烟前，仍然要由各乡保甲长，会同县公署的官员，清丈种植亩数，估计可产烟土数，确定上缴烟土数，汇总造册，上报“清查权运局”。在清丈烟地时，承办人员乘机敲诈勒索，凡对他们招待殷勤或塞上腰包者，就少丈少交烟土，反之，则多丈多交烟土。县公署实业股长李文源，在清丈烟地中，大吃贿赂，遭到群众不满和反对，傀儡县公署，不得不

作作样子，把他撤职，委派他人办理此事。但依然照旧，凡没面子、没关系，不肯“出血”的老实人，只有受气吃亏。

在“清查權运局”的管制下，实行对大烟统一配给制，供应社会上销售。私人向公家买上压有“验讫”金字的“官烟”，可以携带或开烟馆零售。不压金字的“私烟”，不准携带贩销，违者按往“敌区”（指入战区）贩运烟土治罪。大余太是产烟区，家家户户都有“私烟”，尽管稽查得不严，但在这种伪政令下，却给特务狗腿子造下可乘之机。贫苦农民带上三五两烟土外出，经常被他们恫吓，勒索一光。距大余太较远的明安、小余太一带的贫苦农民遭受这种损害者，不计其数。

在毒化政策下，不仅使日伪人员、地主、特务、狗腿子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且更是造成小帮土匪蜂起不绝的主要原因。每年在收割烟土时，小帮土匪携带武器，假装“抗日部队”探听日伪军情，在烟农家里又吃、又喝、又住，末了敲诈上烟土而去。接着又来了一帮土匪，假装日伪军，侦察入战区的

军事动态，同样要吃、要喝、要住，勒索上烟土而去。烟农两头受气，苦不堪言。九份子村一个单身汉烟农刘二气愤之极，忍无可忍，一次乘土匪喝水时，抢去土匪的手枪，击毙二匪，抛弃了他的一切家当而逃。

由于当时广泛种植和出售烟土，所以吸食大烟者与日俱增。男的、女的、老的、年青的、大多数人染上这种嗜好。他们抽大烟抽得面色铁青，萎靡不振，烟瘾发作时，又打哈欠又流泪，浑身没劲动不得。有的青年妇女吸了大烟，什么丑事都能作出来。民间如此，政府官员也不例外，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抽大烟。后来又用大烟制成料面，不但吸上劲大能过瘾，而且携带使用都方便。在大烟料面的泛滥下，大大摧残了同胞们的身体健康，消磨了斗志和气魄。幸亏八年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其毒害后果不堪设想。

#### （6）身份证件束缚手脚

日寇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长久统治余太地区的人民，所以凡十八岁以上的男女成年人必须持有“良民证”（身份证明书），有证者、行动

方便，不受阻拦；反之，则按“坏人”“嫌疑分子”论处，有杀头的危险。发良民证的办法是：每人照一张胸前戴上编列号码的一吋半身像片，由保甲长开上证明，领到警备股审查办理填发手续。以身份证号与照片号相符为准，在贴照片处，轧上发证机关钢印。在空格里摺上本人两个食指印纹。由于这是生命安全与否的“要命证”，所以承办单位，可以借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凡给他们送礼行贿者，则顺利发证；相反，则故意刁难，甚至借口陷害。群众怨声载道，怀恨在心，终于向承办手续的警备股长、日本指导官告发。敌人为了收买民心，巩固政权，不得不把承办人警尉高奎之、警尉辅王汉城、警长李端、警士赵记泽四人撤了职，另派刘班和其它四个警长警士办理此事。从此，有所好转，但这事要与家家户户的男男女女打交道，而且又是群众最愤恨的事情，因而在发证中，伤害群众自尊心和其它为难之处，仍难免发生。

自从发了良民证以后，对无证者，成了怀疑杀害的对象，一经抓获，由宪兵队审讯处治。在非刑拷打下，其后果不堪设想。有一次抓了个来

城里探亲的毛毛匠，此人身着长衫，头留长发，日寇怀疑是个“探子”，于是把他拉到东门外距城壕偏西二百米处，捆在柱子上，当成活靶子，由十二个鬼子轮流向毛毛匠任刺一刀，但最后的一个鬼子必须把毛毛匠刺死。又一次逮住牛六、牛五兄弟二人和另外的一个人，也拉到东门外捆在柱子上，一个一个、一刀一刀地被刺死。

### (7) 宪兵机构残酷无比

日寇占领余太城以后，建立了宪兵队，日曹长岸熙担任队长，由王雁五任翻译。宪兵的服装与一般士兵相同，唯在臂上佩戴“宪兵”二字袖章。他们不但管中国人，还管日本兵。队部设在现在的派出所院内。在队部三间牢房里，用粗椽子筑成栅栏，一旦把人关了进去要想出来，难如上天。在宪兵队长岸熙手下，豢养了若干中国人当特务，他们遵照岸熙的命令，用打军棍、灌冷水、过电等手段审讯折磨人。他们是一帮侦察、扣捕、毒打、杀害同胞的刽子手。宪兵队附近的居民或过路人，经常听到队部里传出的审问声拷打声，更令人毛骨悚然，凄不忍闻。

有一次，一个人叫张国兵，按“嫌疑犯”拉出东

门到头份子，三份子等地游村，然后返回西门外二堰壕被鬼子一刀砍死。另一次又逮住“嫌疑犯”三十多人，他们觉得砍头刺杀都不过瘾，采取了另一种残暴手段，即事前在东门外，挖了长三十米、宽一米多的一道壕，把挖出的土堆在西面，形成了一道长坝，然后把这三十多人拉到坝上站成“一”字队形，接着鬼子头目一声令下，只听哒哒……机枪由北向南扫射，三十多人中，有的死去、栽到壕内，有的受伤未死，有的屹立不动，他们记了数字，然后把未死的人都推进壕里完全埋掉。

#### (8) 派遣特务进行活动

随着日伪政权的建立，日本的特务机构也建立并活动起来。当时由包头特务机关，派来日本人小林在安北县地区搞特务活动，由蒙人巴兵青当翻译。此外，还有日本人小仓、汉人范××两名特务也来安北县活动。小仓本人于一九三七年前即潜伏于东北蒙区，他在刻苦学习下，精通蒙语，熟悉蒙古人的风俗习惯，穿上蒙古袍，蹬上三角头靴子以后，其举止言行，与蒙古人不差分毫。

可能是出于军事需要，小仓、范××二人，化装成“蒙民商人”，拉上骆驼、驮了些火柴、布匹，经中后旗一带到陕坝。当时陕坝是八战区的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的所在地，为了联络蒙古人，搞好蒙汉关系，对这两位“蒙民商人”不但没有刁难，反而受到欢迎，就这样被他俩钻了空子，完成了他们的特殊任务。

此外，有个日本人叫田中休山，他在包头成立了“水印公司”，利用中国哥老会组织，进行特务活动。后来在余太城成立的“唐公馆分会”，便是他向安北县派出的特务机构。于是余太在关帝庙后面也成立了哥老会。有个叫魏××的三龙头，被发展成“唐公馆分会”的会员。这个组织扩充了不少人，还组成武装力量，由于生活困难，有二十多人到坝湾打鱼维持生活。

### （9）大蒙公司盘剥民众

在日本的傀儡政权建立以后，余太城成立了“大蒙公司”，设有批发部、零售部，是经营皮毛、碱盐、布匹的官办企业。日本人佐佐木担任顾问，一个汉人担任经理。公司里有十几名雇员，大部分是山西岱县和包头人。他们还在南昌



设立了“出张所”（展销的意思）。因为南昌位于乌梁素海东海岸，是入海的关口，是向后方推销货物的场所，也是后套商人以皮毛、粮食换取必需品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市场很活跃。“大蒙公司”每年赚得巨额利润，佐佐木一帮人从中捞到不少油水。佐佐木过着天堂的生活，娶了个中国女人，由他遂心所欲的玩弄。

当时，为了防止在进出货物中发生意外，由伪政府人员、特务、宪兵等组成检验机构，对出口的货物要经过许可，对进口的货物要经过检验，否则，不能随便交易。其地点设在宪兵队附近，一旦发现问题就近由宪兵队处理。

#### （10）食堂妓院生意兴隆

日寇占领余太城以后，在前街西头开设了“富士食堂”和“代歌楼饭店”。代歌楼的东家是日本人，名叫八木，性格非常暴躁，而其女人却极为温柔娴慧。他们顾了三个姑娘，接待顾客。后来还顾上中国工人开设缸坊，大获其利。至于富士食堂，则是一个朝鲜人开设，也顾了三个朝鲜姑娘当招待。由于这两家都有美妙俊俏的花姑娘殷勤接客，笑脸待人，所以经常招来顾客光临。

这两家饭店，以接待日本人为主，汉人当官的也还对付，不接待老百姓。顾客们大吃二喝，十分欢畅，加上女招待斟酒劝饮，更是云里雾里忘其所以。日本人带了醉意以后，往往敲盘击碗而歌，女招待也随之和歌，到极其欢乐时便翩翩起舞。当女招待者为奴婢地位，不能与客人平起平坐，但在客人们酒酣兴发之时，身不由己任其蹂躏，不一而足，狂呼乱叫，经常直到深夜而散。

在这两家饭店的后面，开设了随军妓院，这里有近二十个妓女，专门接待日本人。妓女的装束与已婚的妇女不同，如顾问林宽忠，首席指导官冈部正好，指导官小池猛等人的女人，均穿着仿效着我国古时的“吴服”，而妓女们则穿一般“和服”。他们打扮得妖艳异常，极尽其媚诱之能事，所以比饭店“生意”更兴旺。

妓院的房间特异，进了大间套小间、出了这间进那间。不熟悉情况者，进了妓院找不见出口，日本人在酗酒以后，三三俩俩钻进妓院，他们借上酒疯，对这些可怜的姑娘，出尽丑态，为所欲为。妓女们对这帮酒色狂徒，只有逆来顺

受，任其摆布，不敢有丝毫怠慢。每个妓女每天接触几名日本人，叫什么名字，要有记载。过上一定时间以后，日本人对这些妓女玩弄腻了，于是来一个换班，去旧迎新。这些法西斯狂徒，自知来日无多，只不过是借酒色来麻醉身心，聊以自慰而已。

### （五）同仇敌忾怒杀高桥信雄

余太城被日寇长期统治以后，八战区的军队经常以游击战术，袭击小股日军和伪警察部队，致使他们顾此失彼感到不安。特别在四四年接近胜利之际，游击活动更频繁起来。八战区三十二师九十五团派一个连在袭击南昌据点时，尽管牺牲了一位连长×××，但大大地打击并震惊了日寇。

当时八战区还成立了游击大队，游击别动队，在三公旗、安北县一带，打击骚扰敌人。大队司令苟子成与支队长王国祥互相配合下，袭击过石纳干的伪军、伏击过日寇的汽车队（击毁汽车一辆，活抓了一个日本人，送到八战区长官部）。别动队的人马袭击过警察中队在陶来口设

立的警察所、后口子的警察中队和谢俊圪卜石绵厂。在乌兰胡洞，拦截过由包头开往余太的七八辆汽车。

此外，南昌是大蒙公司与后套商人交易的所在，各式各样的人，来来往往十分复杂，表面看是商人穿戴，实际上都是暗带武器，有身份有职衔的人，这里派一个警察中队，由日本指导官高桥信雄指挥一切。其任务是维持管理这个场所，防止入战区渡海奇袭。

南昌的警察中队，住在三角土围内，以求安全。指导官高桥信雄，在这里说一不二，任何人不敢违抗，而且他性格暴躁傲慢，根本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开口骂人举手打人，是司空见惯的事，几乎所有警察都挨过他的毒打责骂。在这部分警察中，固然大部分是坏蛋赖鬼，但也有由保甲上抽派来的好人，这些好人气愤之极，蓄谋已久，准备干掉这个坏蛋。

一九四三年春，在乌梁素海将要解冻的时节，大家认为时机已到，准备杀死高桥信雄后，逾海投奔入战区。于是王六十二、高有宽等十几个人，七手八脚把这个罪大恶极的高桥信雄击

毙。正在准备过海之际，日寇发觉，紧急命令追捕暴动人员，这时王六十二、高有宽二人逃脱，其余的人见势不妙，急忙装成追捕凶犯人员，把罪责全推到王、高二人身上。这下捅了弥天大祸，城里的日本司令官，立即派人清查这二人的来历，并命令即刻捉拿家属偿命。

王六十二家住台梁七份子，高有宽家住在台梁牛场沟，都是地方上抽派的警察。于是首席指导官冈部正好，大队长李玉昆带领警察三十多名，坐上汽车，飞驰台梁把王六十二的母亲和他十二岁的弟弟抓到城内（高有宽的家属没有抓上），日本司令官石桥，立即批示由地方上把这母子二人枪决。

这事应由警备股负责执行，警备股长郝先桥和文书刘班等人认为：司令官的命令谁敢违抗，但杀王母还则罢了，若再杀死十几岁的小弟弟，感到太残忍。于是由郝先桥向日本指导官小池猛求情，希望饶这个孩子不死。小池猛也怕司令官追究责任，不敢违令也不表态。后来郝先桥提出个主意是先把王母杀死，把小孩押起再说，小池猛暗示同意。于是城里杀气腾腾，彰明昭著地把

王六十二的母亲在西门外杀死，把王的小弟弟王占山关了起来。

事后大家怕出事，由郝先桥把镇长武正荣、维持会长陈虎找来，让他们写了个证明，由刘班盖了个警备股办良民证的印章。这个印章守城的人，甚至日本人都熟悉，有它就可以通行。就这样把这个孩子王占山送出城外，到其亲戚家居住而得救。

### （六）敌人的可耻失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傅作义指挥所属部队攻打包头时，曾派三十二师九十四团（团长杨新钊）一营营长鲁乐山，带一个营的兵力，在后口子阻击余太日军增援包头。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该营驻到后口子的第二天夜里，鲁乐山查哨时，发现余太日军司令小林一男的增援部队，于是立即展开战斗，在距后口子十五里处的昆独崙沙坝子附近，把小林一男击毙（小林的翻译朝鲜人，日语名叫曾子亚谷腿部受伤）。这个镇压屠杀了多少中国人民的罪魁祸首，终于死在中国人的枪弹之下。事后余太的日军开“慰灵

祭”（即追悼的意思），由部队中的两个士兵穿上袈裟，念经超渡。接着由石桥（日语依西哈希）继任司令官之职。

一九四零年元月，日寇由山西、河北调兵遣将，分三路大军进犯河套，直至陕坝等地，二月份又撤退到永济渠以东。日寇水川中将，前往五原慰问，并带领一批指导官准备分配工作，长期统治后套，结果三月二十五日五原战役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水川中将被杀死在二驴弯一带。事后日寇出动直升飞机侦察，还由余太派兵过乌加河到二驴弯一带，找寻水川的尸体，结果杳无音信，水川死无葬身之地。

一九四四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由余太抽了不少真日本人，去参加作战，留守余太者无几。于是把伪军乔二成收容的四五百人马，编成西北挺进军当炮灰。他们大部是山西人，身穿黑衣服，派到石纳干一个连驻防。但这一切根本挽救不了日寇的最后灭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腾鼓舞，扬眉吐气，而日寇灰眉溜眼，咳声叹气，往日耀武扬

威，杀气腾腾的屠夫变成“温顺的羔羊”。当余太城里的鬼子接到命令以后，立即关闭城门，以防非接受的部队，缴了他们的械。不久，三十二师奉令东进，在经过余太城时，杨镇田营长与城内日寇司令部留守人联系，宣布他们集中投降交械地点在包头。日寇狼狈不堪，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命令。然后三十二师浩浩荡荡向东开去。这时，伪警察中有三十多人偷偷跳出城墙，与三十二师联系要求投诚遭到拒绝，让他们按规定地点受降。只把精通日语的苏长河带去当翻译。

在日寇按规定去包头集中交械的途中，遭到八战区杂牌军郭堂团在乌兰忽洞的截击。这时他们只求侥倖不死，不敢开枪还击，后经负责送鬼子去包头的杨镇田营长向郭堂团联系说明上级的指示精神以后才停止了战斗。鬼子们才安了心神，其狼狈相实在可笑。

伪行政人员和警察中的东北人，为了赶快离开长期作恶多端的余太城，急切地想开往包头。但本地警察，则怕被整编后离家过远，不愿去包头，于是在去包头的途中，有一部分当地人哗变，投奔到土匪队伍中去了。



三十二师的杨镇田营长离开余太东进以后，大余太由绥西官员赵炽昌接管整顿。从此，余太城归到八战区的管辖范围。一场大屠杀、大镇压、大奴役、大毒化的历史从此而告终。

七年多以来，余太城在敌人残酷杀害以及宪兵警察的欺压骚扰下，使四五百人，抛头颅、洒热血，使无数的人民遭折磨、受摧残。特别是在奴役毒化政策下不少人消磨了斗志，丧失了气节，这些惨酷、恶毒的历史，应当记下来，传给后代。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终于落了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受到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处决。战争给日本人民也同样带来死亡、痛苦、折磨，相信日本人民永远会吸取这一严峻的历史教训。中日两国人民应当紧密团结起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反对军国主义的复活，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抗日战争教训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也锻炼了亿万中国人民，今后如有任何侵略者，胆敢入侵中国，相信他们的下场将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下场，更为悲惨，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世界人

民，将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

（承蒙邬三来红、王国祥、刘班等老者提供有关资料谨表谢意）

# 原安北县王锦云 副县长等遇害的简要经过

董 玉 奇

## (一)

原安北县于一九四九年“九·一九”和平起义。从此，虽然这是迈向解放大道的转折点，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开端。在起义不久的日子里，安北县的环境十分恶劣艰险，斗争也非常尖锐复杂。王锦云副县长上任仅仅二十多天，就和县委书记吴海，通讯员郝瑞云等三人，被叛匪杀害于德岭山下。不幸的消息震惊了绥远省的各个角落，引起了各级军政领导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悲痛与愤怒。

后来，经过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组织群众，开展了广泛深入、大张旗鼓地剿匪肃特运动，终于消除了革命的障碍，打开了解放的通衢。那些杀人凶犯，在侦缉、追捕之下，先后落网归案，并分别依法制裁与处决。

王副县长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英勇顽强，为党为人民做了一定贡献。谁想他在支援安北县建立政权之中，竟惨遭叛匪杀害，怎不令人悲愤痛惜？！为了悼念先烈，同时说明今天的政权来之不易，特将王副县长等遇害的简要经过概述如次。

## （二）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省起义以后，在旧制度没有改革，新政权没有实行以前，一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仍维持原状不动。原安北县长冯铭汤以及其属下各科室、各部门人员，一律包下来继续留用。警察局约一百多人，仍归冯铭汤指挥，保警队约二百多人，也归他掌握。在这期间，旧军政人员中，对形势的认识不同，思想顾虑各异，十分混乱。

五零年元月份，冯铭汤被调到归绥离职学习。时隔不久，河套地区的生产建设工作总团五原（包括安北、晏江）分团到达五原县。以王正大为团长，张鸿恩和王锦云为副团长的安北工作团有三十多人，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各项

政策，打消群众各种顾虑，提高贫苦农民对党的政策的认识和觉悟水平，发动并组织大家大搞生产。在此基础上，进行减租反霸、废保建政等工作。

工作团的成员中，绝大部分是冀中八分区和山西老区抽调来的干部，此外，还配备了些绥远省新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和少数起义人员。由河北、山西抽调来的同志，绝大部分是久经锻炼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优秀干部。在他们的带动下，大家都服从领导调配，勇于接受任务。他们背上背包，徒步跋涉，去到东西最远点将近三百华里，南北最宽点约一百多华里的县境范围内，开展工作。工作团进村以后，人地两生，不摸各个方面的底细。不少贫苦农民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威胁，不敢与工作团接近，以致使他们有时在吃住的问题上都遇到困难。另外，有的旧军人和反动地主、恶霸，勾勾搭搭，他们中间不少人私藏武器，不论白天黑夜任意打枪，在新安镇街上出现了反动标语，给工作团住的院内竟投掷手榴弹，幸好没有爆炸。凡此种种使老乡、居民恐惧不安，给工作团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困

难，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一切，说明有人妄图制造恐怖气氛，恫吓工作人员畏难而退。

另外，当时流窜在包头、固阳、安北一带的武装土匪，有七八股。其中以张崩芦、王毛仁的喽啰较多。他们人人骑马，个个持枪荷弹，抢劫民财、骚扰百姓。尽管当时在新政策感召下，有些土匪弃暗投明，但这两股人马仍各有数百之众，继续东流西窜为非作歹祸害人民。此外，还有些小股土匪，也乘机兴风作浪，如西山咀到乌拉山之间的刁人沟内，隐藏的土匪，曾两次拦劫汽车，闹得一度几乎使交通中断，而居民则终日惶惶不安。所以工作团人员一旦遇上这帮亡命之徒，生命就很难保全。这也是当时形势严峻的又一方面。

但工作团绝大部分人员，在上述险恶困苦的环境里，表现的勇敢顽强。他们成天东奔西跑顽强地开展工作的。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中，宣讲了党的各项政策，消除了贫苦农民的顾虑，并逐渐提高觉悟。在此基础上摸清了各个方面的底子，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样一来，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贫苦农民向工作团靠

拢过来，给地主豪强一个严重打击。但敌人不甘心死亡密谋暗杀工作人员，而王副县长等下乡回县时，遭到叛匪的杀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 (三)

安北县于五零年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了县人民政府。由张鸿恩任县长，王锦云任副县长。接着，决定召开全县人民代表大会，以便宣传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消除群众中的思想顾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动组织群众大搞生产以及铲除落后群众偷种的大烟。但由于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如把全部代表集中在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新安镇开会，困难很大。于是，决定套内三个区的代表在新安镇开会，大小余太四、五区的代表就近集中在大余太开会。

五〇年五月四日，套内三个区的人民代表，在新安镇桥南学校报到开会，七天以后大会闭幕，各地代表分别回村工作。隔了一天，王正大（政委）以生产建政工作团团长的身份，召开了团委会。出席人为张鸿恩、吴国柱、王锦云、刘

忠在等。绥远省政府派来的，铲烟团团长张凤来，列席了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团委成员分头下乡，和铲除烟苗等问题。会议最后决定派副县长王锦云和县委秘书吴海二人，到大余太参加会议并开展工作，同时由公安局派局员夏宣三，带领三十多名警察，护送王副县长等人到大余太就地协助搞铲烟苗的工作。

会后，经过一天多的准备，王副县长等三人以及公安局的护送人员都出发了。他们绕过西山咀，踏上去大余太的大路。王副县长、秘书吴海、通讯员郝瑞云三人，骑的是旧职县长冯铭汤骑过的三匹快马，他们一路奔跑，当天就赶路一百五六十里，到达大余太。而公安局夏宣三带的三十多名警察，却住宿在二寡妇店吃饭休息。

翌日，夏宣三带领警察，正在继续向大余太行进中，听说在西公旗驻军中，约有一个连的人马叛变，已经由南昌北上，他们还发现了零散的叛匪，在追赶他们的部队。同时还被他们逮住三个匪徒，匪徒骑着从老乡那里抢劫来带套缨子的骡子。从这些事实证明，前方确实出现了叛军。所以夏宣三不敢带队再去余太，于这天又返回西山



咀，向公安局长报告了叛匪情况以及逮住三个叛匪的经过，同时还把逮捕的叛匪，送回公安局处理。后来夏宣三，又把三十多名警察带回县城。

王副县长到达余太以后，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大搞生产，了解人命案件。广大的贫苦农民激动地说：旧社会里，“县太爷”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今天我们能和县长平起平坐拉家常，真是梦想不到的事情。

王副县长到余太没有几天，即接到县上的电话说地区召开会议，请他连夜回县。王副县长毫不犹豫决定连夜回县。临行前，大余太工作组长李修身同志，给他拿了一支连发枪，以备途中自卫使用。另外，由闵富之（主任指导员、代理区长职务、人称闵区长）派驻余太的保警队班长董喜小，副班长张文源、翟记兴，士兵杨金保、李五儿、贾宽仁负责护送王副县长等三人回县。由教导员兼分队长云占山带队执行任务。他们七人全部骑马带枪，杨金保扛的是挺轻机枪。这支人马，按照既定的线路，于天黑以后向余太西奔去。

当李修身同志发现护送王副县长的保警队叛变，王副县长等三人的下落不明以后，立即挂电话，向县上汇报。但叫了半天叫不通，后来让余太邮电所接后口子，包头，再转接安北，才接通了电话。由于电话线路转接的太远，讲话听不清楚，不得不借助于沿途话务员，转达保警队叛变的情况。

张鸿恩县长听到这一消息以后，立即去见政委王正大，然后两人去找公安局长刘忠在，让他立即派人侦察王副县长等人的下落。与此同时，李修身同志也派人到各处打听王副县长等人的音信。三天以后，一位羊信急急忙忙，来区公所报告，说他在德岭山滩里发现了三位先烈的遗体。区上把这个情况立即报告到县里，并给这位羊信以精神和物质奖励，接着公安局派出侦察王副县长下落的范建功，也向县里报告了这一情况。

由于当时气候变热，在工作组的成员和余款城里雇用保长张七老汉，用三口棺材入殓三位先烈遗体时，惨不忍睹，谁也抑制不住衷心的悲痛与愤恨。接着把三位先烈的灵柩，存放到城里戏

台下，广大群众在悲痛中说：“真惨呀！想不到王副县长等人，竟无辜牺牲在德岭山下！更想不到，就是护送他们的人，杀害了他们……。”

后来把三位灵柩运到新安镇南树园。安北县召开了追悼大会，各机关、单位、团体、学校的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和广大群众到会悼念，不少单位送了花圈挽联。追悼会由县长张鸿恩主持，政委王正大致悼词。他以沉痛的心情介绍了王副县长是陕西延长县西砭村人，出身贫苦家庭，很早参加了革命，曾任过县团级职务。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身经百战，多次负伤，屡历战功。“九·一九”绥远省起义以后，他怀着解放绥远，建设绥远的愿望，来到安北县工作。谁想到他竟和出生在山西偏关县的秘书吴海及出生在丰镇县的通讯员郝瑞云，牺牲在德岭山下。这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阴谋策划所犯下的罪行！这笔血债一定要清算！他还激动地希望所有革命干部，广大群众揩干眼淚，化悲痛为力量，行动起来，侦缉匪特依法惩办。

五〇年秋，秘书吴海的哥哥来到安北县以后，用大车把秘书吴海的灵柩运到西山咀，用划

子顺退水渠送入黄河，然后顺黄河用大船漂流回山西偏关县。王、郝二位的灵柩，存放在南树园一间小房里，用泥把小房抹严，直到五〇年冬季快过新年时，上级通知把这两付灵柩运往呼市。启程之前，新安镇李生益，在一个通宵里，冒着严寒，照上腊烛，彩画好棺木。然后雇用刘元厚和毛天恩的两辆大车，由赵玉山同志押运，从新安镇走了整整四天，才到了包头。又等了十七天、集结到七付灵柩，运到呼市，埋在烈士公墓里。王副县长的女儿，长途跋涉，来到安北县时，连她父亲的灵柩也没见上，只好去呼市烈士公墓哀悼祭奠。

#### (四)

至于王副县长等三人究竟是如何被害的呢？

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天黑，王副县长等三人和护送的保警队人员离开余太以后，经西水道村向西奔跑，由副班长翟记兴在前面带路。翟记兴根本不走正道，他专门领到苜蓿滩里左拐

右绕，经过一番艰难的奔走，来到德岭山红山口荒无人烟处，在王付县长三人毫无半点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先由云占山开了枪，接着张文源、翟记兴、杨金保、董喜小等也都开了枪，射击王副县长等三人。王副县长首先被张文源击中，接着秘书吴海被云占山击中，他二人倒在血泊里牺牲了。留下通讯员郝瑞云仅十八九岁，因为他是跟随王副县长，所以也没逃脱他们的魔爪，被杨金保击中壮烈牺牲。这伙匪徒得了三支手枪和三匹大马以后，云占山便命令大家上马返回余太附近的狄虎补隆，与保警队指导员范世良相会。翌日，在范世良家吃的饭。

范世良为什么在这个村呢？原来在一九五〇年的二月份，上级调他到绥远省城去学习，他走到包头以后又返回余太。一九五〇年三月，杨世勋（保警队大队长）派他去太阳庙与匪军联络领番号（即拉出保警队以后，杨世勋当司令，范世良当团长），结果没有联络上，于是他把家搬出余太城。当王副县长下乡到余太时，杨世勋派士兵李天祥给范世良送了个密信说：“王副县长已到余太，不要让他回去。”于是范世良找云占山

密议：“送王副县长等人回县时，在半路上打死他们。到时候首先由云占山开枪，然后相随的人一齐开枪，事后拉走队伍”。当云占山照计划行事之后，所以返回狄虎补隆与范世良相晤。范、云二人在暗中策划和威胁煽骗下，于王副县长等牺牲的第二天，拉上余太城里的士兵李天祥、李正武、王蛇、许喜财、李应录、陈士珍、梁占录等人，全副武装骑马叛变。接着士兵何占荣、王富元等也自动追范世良叛变。他们向西奔驰，在石纳干住了一夜，然后去投叛军卢惠部。

王副县长等遇害的第三天，杨世勋和中队长武正安赶到余太，借口运送军装，还扬言要追赶消灭云占山、范世良等叛军，结果他俩和分队长张永明等西去叛变，藏在白彦花张永明家的区财粮助理员柴楹也去追赶云占山投卢万惠部叛变。

一个月以后，他们这伙人在黑沙兔被骑五旅收编，驻防五原郭家地。原安北县长冯铭汤，去告诉杨世勋说：“政府要抓你们，快跑吧！”还说他已与西公旗郝游龙部联系好了，让他们快去投

奔郝游龙部。于是在骑五旅准备缴这伙匪徒的枪时，杨世勋便带上这些人，到北山畔一带活动，然后投入郝游龙部。一九五〇年七月郝游龙部又要缴他们的枪马时，范世良又带上人投靠起义过来的张汉山部，以求隐蔽。

这伙匪徒在流窜的过程中，无所不为。张文源在莫楞河，大树圪旦一带奸淫妇女、抢劫民财；翟记兴在本县刁抢过民马；董喜小在骑五旅时集结十余人，到河西抢过民马五匹；何占荣也抢过一匹民马。后来这伙匪徒怕露了马脚，便分散行动，各自逃生。

### （五）

在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纵深发展中，任凭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任凭他们如何狡猾隐蔽，终究逃不脱人民的天罗地网，这伙罪犯先后归案。按照他们的罪恶大小，坦白认罪程度以及区别主谋协从界限，分别予以镇压和应得的处理。

范世良：指导员，固阳人，由郝游龙部投靠到张汉山部，以后又投奔张璞部。一九五〇年九

月隱藏在固阳，改名刘丑小，被群众发觉后逮捕。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九日收案，同年四月三十日按反革命犯执行枪决。

张永明：分队长，住余太白彥花村。一九五〇年七月回家后被发觉扣捕。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九日收案，同年十月五日按叛匪执行枪决。

董喜小：班长，余太人，从张汉山部逃回余太，潜伏在后山一带，被人民检举揭发后逮捕。一九五一年二月收案，同年三月九日按反革命犯执行枪决。

张文源：副班长，余太十三份子人，在走投无路时，混入三十六军及张璞部，以后改名鄂占山，又名张仓小，参加抗美援朝时被发现。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收案，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七日按反革命犯执行枪决。

翟记兴：副班长，余太通顺泉人，他从郝游龙部投奔其他部时，回到余太，被群众告发逮捕，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收案，同年四月八日按叛匪杀人犯执行枪决。

何占荣：兵，余太脑印商人，被骑五旅收编后逃跑，潜伏流窜在三湖河、包头、萨县一带。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收案，同年八月二日按叛匪判处监禁十五年。

李五儿：兵、余太南團匪人，投奔张汉山部队以后，一九五〇年六七月间回余太自动交待问题，禁闭七个月后释放。

贾宽仁：兵，余太九份子人，在张汉山部坦白了自己的问题，揭露了其它人犯，受过警告处分。五二年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回乡劳动。

柴楹：余太区的财粮助理员，山西人，潜伏在山西太谷县，参加了工作。五五年他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对反革命分子自动坦白交待从宽处理一文以后，请假来绥远公安厅投案。当他回到安北县以后，曾在桥南戏台上，向干部群众坦白悔过认罪。根据中央当时的政策精神，宣布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发给路费仍回山西工作。

扬世勋：保警队大队长，萨县人，在策划部下叛变杀人以后，走投无路，曾投奔张璞部，后来潜伏在萨县被捕。省公安厅送回安北县执行枪决。

云占山：教导员兼分队长，土旗人，在走投无路时，混入起义部队，据何占荣反映从朝鲜抓

回后枪决。

另外，与本案有关的人犯如冯铭汤、闵富之、武正安、杨金宝等人均先后在其他地区扣捕、分别依法处决与判刑。

## （六）

总之，安北县在解放初期，形势复杂险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武装土匪骚扰人民，地主恶霸气焰嚣张，至于特反分子更是恶毒猖狂。自从工作团进村以后，经过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群众，展开了清剿匪特、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使安北县沿着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的道路上前进，从而实现了真正的解放。但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是在恐怖险恶的环境中、枪林弹雨中，用革命干部的汗水和先烈们的血肉之躯换来的，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在祖国阳光普照，繁荣兴旺，四化建设蒸蒸日上的今天，我们绝不能忘记那不平凡岁月里的种种经历，不能忘记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英雄。

王锦云副县长虽然与世长别，但他的革命精

神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为了悼念三位先烈，经安北县人民政府，报请绥远省转报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把他们遇害的德岭山改名为锦云山，以寄托人们的哀思。

# 我们所知道的乌梁素海

陈建盛 董玉奇

乌梁素海风光秀丽，水产资源丰富。这里与河北白洋淀相媲美，与江南水乡相争艳，是内蒙古著名的淡水湖泊，是沙漠中的世外桃源，所以被誉为“塞外明珠”。乌梁素海的最初形成与变迁，有待于专家们研究考证，我们仅就近现代的一些情况，简要介绍如下，以供参考。

## 一、自然概况

乌梁素海，位于乌拉特前旗的中部，东海岸似弓形，西海岸呈直线，犹如月牙一般。其中心地理位置在北纬 $40^{\circ}44'$ — $41^{\circ}03'$ ，东经 $108^{\circ}41'$ — $108^{\circ}57'$ ，西海岸与苏独崙、树林子、新安、西山咀等乡接连；东海岸与大余太乡的马卜子、南昌、额尔登布拉格苏木的西羊场、坝头毗邻；北距德岭山不远；南离乌拉山很近。全河套灌溉田地的退水，都由乌加河注入海内，大小九道排水

渠，也分别由西通向海中。在西山咀乡东侧，有退水渠一道，通向黄河。现在的海城，南北长一百二十多华里，东西宽三十多华里。水面四十四万亩，其中有四万亩与农业社队插花。水深平均一点五米，水位控制在一百零八点五米，冬季鱼类越冬水位一千零九米左右。

在这浩瀚的海域里，碧水粼粼，迎风荡漾，朝映红日，晚泛霞光。来到海中，胸怀开阔，心旷神怡；而到了寒冬季节，海水封冻，大雪覆盖，一望无垠，玉洁无暇。这时，“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景象，一览无余。

驰名的黄河大鲤鱼和其它鱼类，在这里安家落户，生长繁衍。它们色泽鲜艳，机灵善泳，成群结队相互竞追，时而钻入海底，时而跃出水面。有十几种羽毛洁净，光泽艳丽的野禽水鸟，冬去春来，在这里度过舒适的时光。它们有的成群结队，高空翱翔；有的随心所欲，潜水捕鱼；有的成双成对，形影不离。沿海畔浅水区和无本区，长满了芦苇、蒲叶、杂草，郁郁葱葱，十分茂密。这一带，是小鸟乘凉、歌唱、调情的好场所。

所，是沙鹅、白鹅、野鸭交配、产卵，育雏的好地方；尤其是龟鳖晒盖、下蛋、孵化的良好场所。大海到处惹人留恋，游人经常乐而忘归。

乌梁素海的鱼类，年产量相当可观，主要向当地与呼和浩特、京、津等城市销售。芦苇、蒲叶等年产量更为庞大，是编织造纸的主要原料。乌梁素海洛分场、西山咀、火车站等地芦苇堆积得如山似丘，准备外运应用。这个海，确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

## 二、形成变迁

“乌梁素海”早称“乌梁素海子”，其名称的来历，有两种传说：一是红（乌梁）柳（素海）地区的意思；二是杨树（乌梁素）海的意思。那种说法准确，无从考证。但乌梁素海一带，原来长过红柳，同时流过河，出现过沼泽水泊，是毋庸置疑的。

黄河疏入后套分为南北二河，其北河（即乌拉河，今称乌加河），向东流再南下，在西山咀南与南河汇合。“河长凡四百五十五里，宽一里至七八里，深三尺至一丈五六，由惠德成以下百

余里间，河流枝分如织”而且“河无定形，俗曰坡河行舟、时虞搁浅”①说明此河下游水势平缓宽浅，也自然会形成沼泽水泊地带。黄河含泥沙极多。在乌拉河上游，流量稍急，淤积量较小；中下游水势逐渐缓慢淤积量逐渐加多。所以“乌加河下游，已于道光中淤断，与大河不通，屠申泽即腾格里泊已成陆地”。②从此，乌加河水注入乌梁素海，不再南流。约有四十多里的陆地，隔断南北大河的汇合，于是这一带长起了红柳杂草，可能是“红柳地区”得名的原因。

原乌梁素海子，在乌加河流下游的流域里。东曲西直似弓状，海域约二百亩左右，后来更为缩小。其具体位置：北为洋人渠、乌加河的末稍入海处；南约二十里以外为西山咀；正西临近乌梁素海拐子；东南遥对红门兔。据传说乌梁素海子附近，有乌梁素海村，但这“村”与“海子”谁先出现，无从考证。又据传说海子附近长有杨树，这也可能是“杨树海”得名的来历，无以考证。

自从南北河断以后，乌梁素海一带，成了水草丰盛的良好牧场。光绪二十九年清朝贻谷奉令垦地，三十四年又陆续放地。西公旗境内，什拉

葫芦素与红门兔两地大量放垦。于是这里逐渐形成农牧业兼营的富饶地区。勤劳善良的蒙汉人民，在这里修筑房舍，建立了村落。据高令老人叙述及已故去的老一辈传说，这一带建有：上箭杆补隆、下箭杆补隆、红门兔、东红毛兔、西红毛兔、老鲍圪旦、洋行渠、义和洋行、南龙太、北龙太、大王圪旦、王士英圪旦、庚子叉、二后生口子、二后生梁圪、柴喇嘛、喇嘛补隆、柴碾房、白彦淖拐子、乌梁素海拐子、塔布窰子、庙圪堵、吴旺圪堵、大兴泉、倚进才、田公中、李公中等大小不同的村庄达数十个之多，开垦土地也有数万亩。

当时有一道木板车路，由扒子补隆向东行入红柳滩(今哈惠渠口附近)经过坝头(今东海岸)附近可通向余太。在坝头东北七华里处，有一座土丘圪梁(很早以前东海畔有一道南北防水坝)，木板车从土丘窄处穿过，人们称此地为“南天门”。如今大路、土坝、全淹没在海中，唯“南天门”土丘最高点，还露在水面上，形成了岛屿。在“南天门”西侧叫白彦淖拐子，东侧叫西红毛兔。西红毛兔在解放初期，有几间泥房，有个院子，渔民在这



里打鱼休息，如今仍是渔场的作业点。从“南天门”左右的小岛和由水中打捞出的碌碡、耙、用具等，足以证明原来这一带是陆地，而且居民村落不少。

一九三〇年，是乌梁素海子地区，被淹没成乌梁素海的新开端。原来河套地区的八大干渠，计为永济渠（又称缠金渠长一百零六里）、刚目渠（原名刚目河长七十里）、丰济渠（原名中和渠长九十里）、沙河渠（亦名永和渠长七十五里）、义和渠（长八十三里）、通济渠（原名老郭渠长一百二十里）、长济渠（即长胜渠长一百零九里）、塔布渠（原名塔布河长九十七里），都直接由黄河开口引水，灌溉田地，没有控制流量的闸口设备。黄河水常年不间断地灌入各个渠道，向下流淌，所有余水，全部退入乌加河，注入乌梁素海子。是年，黄河水位暴涨，各个渠道流量猛增，乌加河退水未稍李公中、田公中二村决堤，将村庄田地全部淹没，农民们只好含悲噙泪，向他处逃难。

一九三二年黄河水势更大，各渠道向乌梁素海排水量猛增，乌加河下游的河堤，到处决

口，致使李公中、田公中以北三十多平方华里的地区，全部淹没。大水向南、西、东等处扩散，把侉进才、柴喇嘛、柴碾房、二后生口子、大兴泉、吴旺圪堵、红门兔、庙圪堵、塔布窰子等村庄和田地全部淹没，农牧民开发、经营多年的牧场、田地和房舍再没露出水面，只好扶老携幼，四处逃散，到处讨吃或另谋出路。

一九三三年，不少地主为了排除积水，继续种地，曾共议按占有土地的多寡集资，雇工开挖由西山咀（当时海水已逼近西山咀附近）至黄河退水渠，推选赵炽昌为头领。经过一番艰苦经营及农民们的辛勤劳动，花费了大量资金，退水渠终于开挖竣工。赵炽昌并开渠引水浇灌他在蓆荻滩占有的土地。惜因所开渠道过窄，再加乌梁素海水势继续上涨不止，以致未能救出被淹没的土地。

一九三四年以后，乌梁素海的水势，不但退不出，渗不下，反而不停增加，红山口、莫楞河等山洪也大量排入海内，于是刘补隆、吕圈圪旦、上鸡乌素、下鸡乌素、维圪兔、八倍冰道、石兰计等村也先后遭到水淹。

一九三八年，是乌梁素海水域最大的时期，其北达到台路南；南抵坝头、三里城；东至坝湾、南昌；西到哈惠桥、白盛号、生娃地、黑坝。南北长达一百二十里，东西宽达五十里，使农民遭到莫大的损失。然在军事上形成中、日隔海对峙的局面，同时在渠水横溢，海水猛涨的情况下，也是五原战役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一九四九年，海域面积最大时，达一百二十万亩，大王圪旦（即今五分场附近），正是海子的中心点，淹没田地之广，十分惊人。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关心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于是首先告竣了黄杨闸工程（解放前设想建筑四首闸，控制河套地区各个渠道的引水流量问题，黄杨闸是第一首闸），从而控制了由黄河进水量最大的黄济、杨家河、乌拉河等渠道。后来其它渠口也修筑了草闸、石闸，于是乌梁素海缩小到七十万亩。石兰计、八倍水道、上下鸡乌素、吕圈圪旦、刘补隆等地摆脱洪水淹没，重新见了阳光。树林子、新安二乡，向这些新出水的土地上，迁移了社员，新建了村落，从事农业生产。

一九五四年十月，成立了“安北县乌梁素海

水产局”（区的编制），开始搞渔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以资发展水产事业。当时固定工为三四百人，春来秋去的临时工约在千人以上。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春，成立了十个渔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包括一个船运合作社。到一九五七年在海的南部即坝头发展成渔业高级社。下半年因海水下降，上级决定封海，不准打鱼。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共有职工七十六人。

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前，改为国营渔场。乌拉特前旗划归包头管辖以后，渔场仍归前旗管理。同时挂三个牌子即：“乌拉特前旗水产管理局”、“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人民公社”、“乌拉特前旗水产经理部”。实际上只有一套人马，只不过是分工负责而已。这时期有职工六百四十九人。

一九六一年，河套地区兴挖的黄河引水渠（又名二黄河），全部峻工。从此，各个渠道都由引水渠进水，在调节控制流量上有了把握。昔日任由大水灌入海内的现象得以根绝。

一九六二年八、九月份，乌梁素海直接由

包头接管，其名称改为“乌梁素海综合经营管理局”。

一九六三年秋，乌拉特前旗又划归巴盟领导，乌梁素海也由包头交由巴盟管理。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乌梁素海由巴盟划归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十九团管理。

一九七〇年，政府又重新将西山咀通黄河的退水渠进行了一次挖宽取直工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撤销生产建设兵团，乌梁素海又划归巴盟农管局管理，改名为国营乌梁素海农场。一九七八年又改为国营乌梁素海渔场。

一九八二年，对西山咀到黄河的退水渠，再次进行了一次挖深工程。从此，海面控制到四十四万亩。

目前，全场共计三千七百五十三口人，职工达一千六百六十三人，有渔船一百六十八艘，运输对槽七对，载重汽车十三辆，运输拖拉机九台。沿海四周分置十一个分场，场部下设基建队、机运队、医院、中心校、林场、养殖场等十

几个核算单位。

### (三) 主要水产

乌梁素海的形成年久，海水中有大量的沉水植物和浮游植物；有底栖动物和浮游动物。说明水质优良，营养度高，鱼类等水产动物非常丰富。

乌梁素海以产鲤鱼、鲫鱼为大宗。此外，还从外地移殖来白鱼、青鱼、草鱼、鳊鱼、团头鱼等等。在解放以前，靠捕鱼为业者仅仅几户人家，当时捕鱼极易，不用说一网可打捞无数活蹦乱跳的鱼，就是用鱼叉在海边渠深处，也能叉到许多大鲤鱼。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所限，冬季可向外地运销一点，夏季只好就地廉价出售。一般群众买鱼者不多，渔民到日落时，对剩余的鱼经常倒在渠里。

自从成立了渔业社以后，对捕鱼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渔民们用抓网、套网、合网、冬网、箔旋等方法辛勤劳动，鱼产量大增。由年产鱼六百万斤逐年增加到八百四十多万斤。一九五九年包括小鱼在内产量达一千万斤。在过去冬季照常

作业打冬网，一天可凿冰窟下网三次，每次捕鱼不等。一九六三年一次一网捕鱼七万余斤，其中鲤鱼、鲫鱼都有，鲤鱼占百分之六十，当天运回去三万多斤，次日运回去四万多斤。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捕鱼政策不能很好执行；工业污染，农药毒害，九个排水干渠，向海内排泄碱水，影响鱼类生长繁衍；水位下降到一千零一十八点五米，平均水深由一点五米降到九十公分等等，都是造成鱼产量下降的原因。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鱼产量达三四百万斤。一九六九年仅产到一百多万斤，这年鳊鱼、甲鱼几乎绝迹。目前经过整顿改革，年产量上升到二三百万斤。

至于鱼价，解放初期每斤大鲤鱼仅需洋贰角以下，一九五四年夏天，每斤鱼一角钱，一九六三年调整过一次价格，规定鲤鱼每斤三角九，鲫鱼每斤二角一，而目前，大鲤鱼每斤议价高达三元五角，还不易买到。远远地满足不了人民生活水平上升的需要。

乌梁素海的芦苇、蒲草、更是极丰富的特产。年产量达六七千万斤以上，每斤以四分计

就值二百多万元，若编织成各种编织品，其价值更为可观。但在旧社会，每年冬季在蒲苇枯干以后，除老乡们收割一部分烧火之用外，别无他用，经常被人纵火点燃，浓烟滚滚，冲向云霄，烈火熊熊迎风漫延。经过十几个昼夜的燃烧以后，六七千万斤芦、蒲变成灰烬，价值二百多万元的轻工原料化为乌有。

乌梁素海地区辽阔，芦苇丛生，在旧社会，是土匪出没的地方，解放初期仍然是坏人潜伏的场所。一九五三年冬又发生过点然芦苇的事情，在死人圪旦处，有七个农民，因大火烧来无法躲藏被烧伤。一九五四年成立了水产局以后，加强了管理，情况逐渐好转。解放以后，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每年把芦苇、蒲草等收割殆尽，由各种编织专业组、队编织蓆子、蒲垫、鱼包、苇帘等产品，其余作为造纸原料。一九五六年安北县供销合作社负责专门经营推销鱼类、编织品以及芦蒲造纸原料等业务。

乌梁素海的蒲草、芦苇，不仅是编织、造纸的原料，而且在必要时也是救济牲畜越冬的饲草。一九六二年牧区缺草，牲畜难以过冬，本着



顾全大局的精神，曾支援过中后、临河、伊盟、固阳等地的羊群来海内放牧。一九六五年还大量打割过芦苇四百多万斤，支援了牧区牲畜饲用。

全场的总收入，早期逐年上升。六九年至七六年亏损，七七年持平，七八年以后扭亏为盈逐年上升，七四年亏损最大高达到一百六十多万元，七九年利润回升为三十三万多元，八三年利润达五十二万多元。

当前，在乌梁素海场领导的重视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鱼类、蒲苇等产量，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相信不久的将来，金光鳞鳞的大鲤鱼，定会廉价上市，望不到边的蒲苇，定会得到充分利用。乌梁素海这块塞外宝石，将会闪烁璀璨光辉，开出绚丽的花朵，以崭新惊人的面貌谱写出未来的史诗华章。

注①②见督办运河工程总局编辑处出版的“调查河套报告书”。

## 乌前旗文史资料征集撰写参考纲目

(自满清戊戌政变至解放前)

### 一、政治方面

- 1、有关“九·一九”起义的历史资料。
- 2、有关“三公旗”起义资料。
- 3、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河套政治资料。
- 4、满清、民国时期“三公旗”的政治资料。
- 5、傅作义在河套推行保甲制度的资料。
- 6、解放前国民党在河套一度实施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资料。
- 7、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略河套地区的历史资料。
- 8、解放前国民党在河套蒙旗的党务活动。
- 9、三十年代王鸿一、朱霁青在河套倡办移民活动的资料及河套的河北新村。
- 10、阎锡山在河套办屯垦的历史资料。
- 11、解放前河套及“三公旗”政治历史人物

传略（如巴云英、奇俊峰、王同春、二老财、杨米仓、林沁僧格等）

12、解放前河套“三公旗”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及其它方面著名的专家、学者传略。

1、解放前各蒙旗的内部斗争历史资料。

14、解放前匪盗在河套的活动资料。

15、解放前乌拉特前旗奇俊峰篡权与被杀的前因后果。

16、清末蒙旗王公贵族的变化。

17、乌拉特三旗的独立酝酿和赵守钰的军事镇压（1913年）。

## 二、经济方面

18、解放前有关河套水利的历史资料。

19、解放前河套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形式。

20、解放前蒙旗封建统治阶级对蒙汉人民的剥削。

21、解放前河套、蒙旗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及生产情况。

22、解放前河套一带的工商业及其剥削情况。

23、解放前边客、旅蒙商在蒙旗的剥削情况。

24、解放前河套地区的租税制度。

25、解放前河套、蒙旗商会始末。

26、解放前河套、蒙旗有名的旧商号（如德和泉、三盛公、祥泰魁等）。

27、解放前河套、蒙旗的雇用制度（如雇工，放苏鲁克等等）。

28、解放前河套及蒙旗的工业、手工业发展情况。

29、解放前河套及蒙旗地区的交通、邮电事业发展状况（包括公路、水路、交通工具及邮电事业的发展状况）。

30、乌梁素海的形成和发展。

31、营盘湾煤矿的形成与发展。

32、河套地区的“屯垦队”。

### 三、军事方面

33、清末、民初及国民党统治时期河套、蒙

旗的驻军情况。

34、原西北军占据河套情况。

35、傅作义统治河套时期的军事建设。

36、国民党在河套征兵（抓壮丁）的历史资料。

37、清末、民初蒙旗的军事建制。

38、国民党统制时期各蒙旗驻军及蒙旗地方武装。

39、蒙旗的护路保商团活动。

40、解放前河套及蒙旗国民党驻军之间的矛盾斗争情况。

#### **四、文化、教育、卫生方面**

41、清末至解放前河套地区的教育情况。

42、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河套、蒙旗设置学校情况。

43、解放前河套的地方戏二人台。

44、解放前各种民族形式的文体活动（如赛马、摔跤、射箭以及那达慕大会）情况。

45、解放前外国教会对河套的文化侵略。

46、解放前河套及蒙旗地区的医疗卫生资

料。

47、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旗套的戒烟情况。

48、四十年代初期河套发生鼠疫情况的史料。

49、解放前河套和蒙旗性病流行情况

50、巴盟“实业中学”。

51、奋斗中学、奋斗小学。

52、河套的“八大干渠”工程。

53、河套的水利工程。

54、内蒙西部区的“治黄”工程。

## 五、民族、宗教方面

55、满清政府在河套和蒙旗推行的民族政策。

56、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族压迫政策及民族纠纷事件。

57、解放前河套及蒙旗地区的各种宗教活动（包括佛教、道教、喇嘛教、伊斯兰教等）历史资料。

58、基督教堂在新安镇的形成、发展和活动情况。

59、解放前喇嘛教的封建迷信活动。

60、解放前喇嘛教寺庙的分布及宗教制度。

61、各教会有名的教主、神甫、喇嘛、阿訇、长老、修女等学习生活及各种宗教礼节、礼仪等活动。

62、秘密结社：如哥老会、青红帮，一贯道等活动史料。

63、黑暗社会生活方面：如出名的强盗、拐骗、盗墓、赌博、娼妓、妓院、地痞流氓头子等活动的史料。

64、阿贵庙、善丹庙、得布斯格庙、班禅召等著名召庙的历史撰写。

## 六、其它方面

65、自戊戌政变至解放前这一历史时期、自己亲身经历的或所闻、所见的各地区各种革命的及反动的历史事件。

66、有关巴盟地区的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文物等历史资料。

67、革命回忆

68、火烧乌拉山。

69、杨猴小的土匪活动。

70、鄂四儿的土匪活动。

71、近五十年绥远地区“串话”的特色。

72、河套地区的“顺口溜”反映的社会生活。

政协乌拉特前旗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月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乌拉特前旗文史资料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1 6 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